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
第5-48頁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八十八年四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南勢阿美聚落、人口初探 ——十七到十九世紀*

康培德**

摘要

本文主在運用現已刊行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十七世紀東臺灣的資料，以及十八、十九世紀漢籍文獻檔案，來探討南勢阿美族群在這兩百多年的歷史。文章的首要目的是重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南勢阿美聚落，然後是窺究其人口結構，並試著藉由文獻內的人口統計數據來對十九世紀末的村落人口結構，提出一個可被接受的合理解釋。最後，藉由以南勢阿美的村落為基本單位，來進一步探討十七到十九世紀晚期之間，南勢阿美村落集團勢力的可能變遷。

關鍵詞：臺灣原住民、南勢阿美、臺灣史、花蓮

* 本文取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1997年補助的研究計劃《十七至十九世紀花蓮地區原住民聚落景觀與族群互動之探討》，計劃編號 NSC 86-2415-H-02-002-T 內之部份資料。本研究報告的完成，須特別感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翁佳音先生與詹素娟小姐，以及史語所的劉益昌先生。翁先生不吝提供部份荷蘭文獻中之原住民聚落名稱資料出處，並給予拙作詳盡的指導。詹小姐與劉先生則熱心提供與南勢阿美生活領域互動密切的族群資料，並慷慨提供其個人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研究心得與建議。作者對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也在此一併銘謝之。文中的漏失、誤引等，則為作者的責任。

**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副教授。

一、導論

花東縱谷北段花蓮港一帶華人的拓殖始自 1812 年，李享、莊找自宜蘭募佃向屬南島語族的奇萊五社購入東至海，西至七腳川山，南至寬荖溪（今荖溪），北到荳蘭之地拓墾。1851 年黃阿鳳自臺北艋舺、大稻埕一帶招集十六人出資，募佃二千二百餘人入墾美崙山西側之沖積扇平原，組成俗稱十六股庄等五個農業聚落。⁽¹⁾ 於此之前，此地帶多為南島語族活躍的歷史舞臺。在近代人類學的分類體系中，一般稱之為南勢阿美。⁽²⁾ 然而，我們對於在華人農業拓殖前，此地域南勢阿美的歷史，大多欠缺一較完整的了解。對當地南勢阿美族群的認知，大多來自其與入墾華人互動下所留下的書面及口語紀錄來詮釋。之所以如此，原因大多肇於所依賴的資料較零星且較片斷。對歷史現象的探討，有時會受制於文書檔案與學科方法學，而無法照顧到整個圖像。⁽³⁾ 例如：漢文典籍所重建的歷史圖像，多較偏向十九世紀中末期，且大多受制於以華人社經活動為主體的視野；在另一方面，單論考古學在此區域的證據，則較偏向物質文明（material culture）的記實。加上所描述的社會文化，會因在時間的縱軸上過於久遠，而產生所描述的主體在時間上有不連續（discontinuity）的現象；或因所描述的主體在空間上因有被替換過（replaced），而產生一所描述的主體在空間本身上有一不連續的現象。⁽⁴⁾ 換

⁽¹⁾ 駱香林編，《花蓮縣志》，卷十土地（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8），頁 4；《花蓮縣志》，卷五，糧政、農業（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9），頁 18；《花蓮縣志》，卷五，民族、宗教（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9），頁 5。

⁽²⁾ 雖然民間一般傳統認知大多將南勢阿美視為阿美族此一語族單位下，內部語言文化同質性更強的一個次阿美族群體，但是南勢阿美此一稱謂下所指涉的聚落和人口，仍然存在著相當大的異質性。參見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頁 491-509；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臺北：聯經，1982），頁 141-150。此內部異質性，有部份甚至強過於與其它次阿美族群的異質性。因此，本文對南勢阿美的「南勢」此一用詞，傾向於將之視為一地理指稱下的族群人口。

⁽³⁾ 有關近年來以臺灣原住民族群主體性為歷史研究的討論，請參閱詹素娟，〈族群歷史研究的「常」與「變」——以平埔研究為中心〉，《新史學》6：4（1995），頁 127-162。

⁽⁴⁾ 臺灣考古學界近年來已逐漸重視與歷史學界之對話，嘗試著透過與文字檔案的對話以及晚近考古資料的挖掘，來彌補此一時間上的空白。近期的研究成果，可參閱劉益昌之作品。劉益昌，〈臺灣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之探討〉，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

言之，史料欠缺系統性（systematic）與綜合性（comprehensive）的應用，在族群互動頻繁且紛亂的東臺灣區域研究上，容易產生歷史圖像的斷層。

以南勢阿美為主體的歷史研究，在臺灣學術領域中十分有限，大部份的著作多來自民族學或人類學的領域，1935年（昭和十年）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一書，開始對南勢阿美的過去有所著墨。文中藉由當時田野採集的口述歷史與神話傳說，以及一些古文獻，重建南勢阿美的氏族與聚落的歷史沿革。⁽⁵⁾ 戰後則有李亦園發表過〈南勢阿美族的部落組織〉一文，後收錄在1982年《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一書中。⁽⁶⁾ 李氏之著作主要是文化人類學取向的，不過對南勢阿美的部落歷史也有所論及。其資料大多取自前述的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的著作，以及他本人的田野實察。另外廖守臣亦於1985年的《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一書，提及南勢阿美的族群歷史。⁽⁷⁾ 該書最大的貢獻在於其一九七〇年代以後所做的田野調查，為此段時期的南勢阿美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資料。至於書中南勢阿美早期之歷史，與李亦園之論文一樣，大多取自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之著作。

因此，本文將試著對花蓮地區的南勢阿美，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葉，這兩百多年間的歷史上，做一番補白的研究工作。本文首先從零散的資料中，整理出南勢阿美聚落在歷史上的連續性，並探討聚落與聚落間之關係。觀察聚落彼此間是否有著權力關係的變化。最後，將從十九世紀末所留下的人口統計資料中，根據南勢阿美的人口結構，配合當時臺灣東部區域歷史的脈動，嘗試著對十九世紀末的南勢阿美社會提出一些看法。

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1-20；〈再談臺灣北、東部地區的族群分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1996年6月28-29日；〈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史前時代晚期的文化〉，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1997年5月16-17日。唯受限於學科方法學與資料素材的限制，考古學所建構的歷史、文化面向仍多偏向於物質文明方面。

⁽⁵⁾ 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頁491-535。

⁽⁶⁾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139-178。

⁽⁷⁾ 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1985），稿本。

二、聚落分佈與變遷

(一) 西班牙文獻中之聚落

西班牙文獻中對南勢阿美之紀錄約在一六三〇年代，據稱可能是出自於一六三〇年代在臺灣佈教之多明尼哥神父 Jacinto Esquivel 之手。⁽⁸⁾ 據其記載，西班牙人理臺時曾將其所轄之處區分為三個省區：Tamchuy、Cabaran、Turoboan。⁽⁹⁾ Turoboan 省區 (provincia, partido) 所含之聚落有 Turoboan、Patibur、Rarangus、Chiulien、Tataruman、Saquiraya、Tabaron、Rauay、Chupre、Chicasuan、Pabanan、Saruman 共十二個。⁽¹⁰⁾ 中村孝志考證 Turoboan 為十七世紀末葉漢籍文獻中之哆囉滿，約在今日之立霧溪河口北側。⁽¹¹⁾ 其它屬南勢阿美或與南勢阿美關係較密切者，則包括 Chiulien、Tataruman、Saquiraya 與 Chicasuan。Chiulien 可能為荷蘭文獻中的 Sibilien，在荷蘭文獻中屢被提及。Saquiraya 則為荷蘭文獻中 Sakirays 或 Saccareya，屬南勢阿美。Chicasuan 為荷蘭文獻中之 Sicosuan，屬南勢阿美，在後期之漢籍文獻中作竹腳宣、直腳宣、竹仔宣或七腳川。Tataruman 為荷蘭文獻中之 Tallaroma，在南勢阿美語中有本家之意，中村孝志在其荷蘭時代戶口表中將之歸類為荳蘭、薄薄、里漏三社之統稱。⁽¹²⁾

西班牙文獻有關南勢阿美之記載，至目前為止所發表之資料大多僅止於認知到其存在，對聚落間彼此關聯之描述則缺乏。Turoboan 這一省區的地理範圍界定是肇因於其產金。我們以現今對花蓮縣金礦之了解，其產地應是立霧溪口一帶，也就是 Turoboan 所在之地，此點部份說明了為何西班牙文獻中用 Turoboan 為省區之名——表明其對西班牙人之重要性。對省區其它聚落的了解，在文獻中則相當模糊。

⁽⁸⁾ José Eugenio Borao,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 《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 (1993), 頁 100。

⁽⁹⁾ Tamchuy 在北臺灣沿海之處，約略等於今日之臺北縣靠海之處。Cabaran 則屬今之宜蘭縣境域，Turoboan 則約略等於今日之花蓮縣的平地地區。Borao 在其文中之附圖誤將 Turoboan 置於臺灣東北角海岸一帶實屬錯誤。請參閱 Borao,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Seventeen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 p. 105。Turoboan 省份所含之聚落除南勢阿美外，尚可見花東縱谷內之太巴朗 (Tabaron)。

⁽¹⁰⁾ Ibid., p. 103.

⁽¹¹⁾ 中村孝志, 〈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 《臺灣風物》42: 4 (1992 年 12 月), 頁 17-23。

⁽¹²⁾ 中村孝志, 〈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 《臺灣風物》42: 3 (1992 年 9 月), 頁 97; 〈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 《臺灣風物》44: 1 (1994 年 3 月), 頁 200。

(二) 荷蘭文獻中之聚落

荷蘭文獻內的記錄，在時間上稍晚於西班牙文獻。其中有關南勢阿美以及可能與南勢阿美有關之聚落，除開前述及之 Tallaroma 和 Sicosuan 外，又有些零星聚落之記載，現將之一併討論如下：

1. Kipormowa

有關 Kipormowa 之記載是於 1644 年，一在 Kimaurij，⁽¹³⁾ 叫 Theodore 之原住民告知約略在九年前西班牙曾出兵約 100 餘人，加上 Kimaurij 與 St. Jago 約 100 位成年男子，⁽¹⁴⁾ 聯合進攻這位於海邊，近 Tarroboan 之村落。⁽¹⁵⁾ 根據 Theodore 之報導，Kipormowa 整個村落被燒毀，三位住民之首級被取。事後 Kipormowa 之住民曾對一由華人掌舵，駛往馬尼拉，但在中途遇難的西班牙船攻擊以為報復，船上之落難船員有三十人遇害。⁽¹⁶⁾ 然而，有關 Kipormowa 之進一步消息卻無法獲知。《臺灣日誌》內的地名表 (Lijst van historische plaatsnamen) 中是將其列為在花蓮市附近之海邊，⁽¹⁷⁾ 但實應該在今日的立霧溪口一帶，似乎不屬於南勢阿美。在 1655 年前，已列印出版之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商館日誌中，卻未有進一步之第一手資料。

2. Linauw

Linauw 之記載僅見於一六三〇年代後期。⁽¹⁸⁾ 在一六四〇年代荷蘭人大肆在南勢阿美之區域為探金而活動頻繁，留下不少文獻記錄時，反而未再被提及。Linauw 之音近後來漢籍之里漏社，若將 Linauw 視為里漏，恰可解釋為何 Talleroma 此一重要之聚落在荷蘭文獻中首被提及之時是 1643 年。⁽¹⁹⁾ 因為若 Talleroma 是里

⁽¹³⁾ Kimaurij 又稱 Quimaurij，或金包里社，約略在今日之基隆附近，參閱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頁 19。

⁽¹⁴⁾ St. Jago 在今日之臺北縣貢寮鄉，為三貂社，參閱 Leonard Blussé,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5), p. 689.

⁽¹⁵⁾ Tarroboan 即為西班牙文獻中之 Turoboan。

⁽¹⁶⁾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 258.

⁽¹⁷⁾ Ibid., p. 682. 本文內《臺灣日誌》泛指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此文獻資料。

⁽¹⁸⁾ Leonard Blussé,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1984), pp. 417, 457, 467, 488-489, 495.

⁽¹⁹⁾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55, 134, 140-

漏、荳蘭與薄薄之總稱，Talleroma 和 Linauw 在文獻中之出現並未在時間上重疊，恰符此一推論。Linauw 之所以在一六三〇年代末期會在荷蘭文獻中突顯，乃因其與荷蘭人交好之 Pimaba 交惡，1638 年東印度公司之商務特派員 Wesseling 曾計劃與約 600 位 Pimaba 戰士一同出征 Linauw，不過因 Pimaba 住民夢兆不吉而取消此一行動。因此，荷蘭人對南勢阿美之認知可說是先行透過 Pimaba 住民，意即後者之認知為主，待荷蘭人於一六四〇年代大量在南勢阿美之區域活動時，其認知取向則會轉變，轉成 Talleroma 此一稱謂。

3. Parrapoure

有關 Parrapoure 之記載是出自 1643 年上尉 Pieter Boon 的東臺灣探金隊日誌 (Extractt uyt het Dachregister gehouden bij den Provisioneelen Capiteyn Pieter Boon in't opsoucken der goutmijnne)。據報於當年 5 月 5 日，當上尉 Boon 探金隊一行向 Tarraboan 村落之長老 (overste) 告別而準備下一步之旅程時，村落裡之頭人 (principaelste) 回以送行並幫助探金隊渡河。途中 Tarraboan 住民除了答應與荷蘭人進行貿易外，並很友善地願意提供探金隊小船至 Parrapoure 以進一步探測金礦產地。⁽²⁰⁾ 關於 Parrapoure 此一地則無進一步之資料，不過《臺灣日誌》內的地名表卻將它註為在花蓮市附近，⁽²¹⁾ 似為南勢阿美之聚落。仍而，若根據近期之研究，東臺灣產金之地應於 Iwattan (今花蓮縣秀林新城鄉三棧溪) 與 Papouro (今花蓮縣秀林鄉大沙溪) 間之海岸。⁽²²⁾ 則 Parrapoure 應位於此沿今立霧溪口狹長之海岸地帶。若進一步從 Pieter Boon 之東臺灣探金隊日誌去推測，探金隊於當日在 Tarraboan 送行之頭人慷慨提議援助後，僅以一匹布與對方人之一塊金互贈後即南行過三棧溪往 Zacharija 行，之後則未有 Tarraboan 之頭人或 Parrapoure 之記載。⁽²³⁾ 探金隊在當時似乎並未立即前往 Parrapoure，由此似乎可進一步推測 Parrapoure 不應在與探金隊南行往花蓮之處同一方向。Parrapoure 似乎可能在 Tarraboan 以北近 Papouro (或拼為 Pappourij)，今大沙溪一處之地。若此推論屬實，Parrapoure 應已遠離南勢阿美之勢力範圍。

141.

⁽²⁰⁾ Ibid., p. 140.

⁽²¹⁾ Ibid., p. 685.

⁽²²⁾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頁 17-18.

⁽²³⁾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140-141.

4. Sakiraya

又被記錄為 Saccareya 或 Zacharija。Sakiraya 之記錄始於 1638 年，商務特派員 Wesseling 從 Pimaba 出發親訪此聚落。⁽²⁴⁾ 1643 年 Pieter Boon 之探金隊一行從今之三棧溪口往南行進大約三小時即到 Zacharija。再往下行，渡過數條河即可到達 Talleroma，故其約在今日之三棧溪與花蓮溪間之奇萊原野上。Sakiraya 應為漢文文獻中筠榔榔或巾老耶，後又稱為歸化社或竹窩社。

5. Sibilien

又被記錄為 Sivilien、Siplien。為西班牙文獻中的 Chiulien。⁽²⁵⁾ 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 Paulus Traudenius 於 1642 年初率軍經過此村，當時記載的緯度是二十四度三分，大概在今日花蓮港北方民意村一帶。⁽²⁶⁾ 唯依口碑叫 Tsiwilian 之村落是在今日之水蓮尾。⁽²⁷⁾ 東印度公司的緯度測量或許有誤，因為若按照 Paulus Traudenius 之後的行程記錄來看，一行人並未到達預定的 Takilis，即今日立霧溪口一帶。因為若 Traudenius 一行人已到達立霧溪口南方 20 公里處的民意村一帶，不可能在隨後數日的行進中困於山中，無法達到 Takilis（兩地之間並無山丘阻擋於其中）。⁽²⁸⁾ 因此，Traudenius 一行人活動範圍並未越過今日花蓮溪口一帶，所受困的山應該是今日海岸山脈北段的月眉山一帶。⁽²⁹⁾

⁽²⁴⁾ Ibid., p. 409.

⁽²⁵⁾ Borao,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Seventeenth Spanish Sources," p. 103.

⁽²⁶⁾ 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頁 372-373。

⁽²⁷⁾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14。

⁽²⁸⁾ 郭輝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頁 372-373。

⁽²⁹⁾ Traudenius 一行人在離開 Sibilien 的領域後，於一日之中（2 月 8 日）由北往南經 Pisanangh、Radaan（即 Vatan），並在當地停留和長老（oppersten regent）商談，尚能在傍晚時分抵達 Surassa，可見 Sibilien 的位置不會在花蓮溪口以北。印行於十七世紀的《中國廣東、福建省以及附加的臺灣島海岸圖》（*Pas-kaart van de Chineesche kust, langs de Provincien Quantung en Fokien als ook het Eyland Formosa*）將 Sibilan（即 Sibilien）的大概位置定在北緯二十四度三十分與二十四度三十五分間，約為今日之新城鄉北埔、康樂村一帶。參閱 Christine Vertente et al., *The Authentic Story of Taiwan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ased on Ancient Maps, Manuscripts and Prints* (Knokke: Mappamund, 1991), pp. 92-93. 此位置近《巴達維亞城日誌》中所記載的二十四度三分，即今日之花蓮港北方民意村一帶。兩者都在今日之花蓮市北郊，較近今日立霧溪溪口處。但是若考慮《中國廣東、福建省以及附加的台灣島海岸圖》裡東台灣聚落彼此間的相對位置，即 Sibilan 是在 Pisanan 的南邊、Madan（Vatan）的北邊，而 Pisanan 的位置在今日花蓮縣鳳林鎮一帶。另一方面，Pisanan 的位置是在被稱做「小河」或「黃金河」（Klyne Rivier of Goud Rivier）

6. Sicosuan

僅見於中村孝志的荷蘭時代臺灣戶口表。⁽³⁰⁾ 同西班牙文獻中之 Chicasuan，即所謂之七腳川社。

7. Taccalies

又被記錄為 Taculies 或 Takilis。首次被記載是 1643 年。⁽³¹⁾ 漢文文獻記載為得其黎，得其黎在現在的認知是屬賽德克（Sediq）語族中的太魯閣人（Toroko）。但是在十七世紀太魯閣住民尚未沿今之立霧溪下溯時，此地之居民是否可能與南勢阿美有部份關聯，仍待進一步的研究來澄清。⁽³²⁾

的河道與中央山脈之間，而 Sibilan 在圖上是在「黃金河」之南。加上圖上的「小河」或「黃金河」與似今日秀姑巒溪、卑南溪者連成一氣，故「小河」或「黃金河」亦有可能是今日的花蓮溪。那麼 Sibilan 應該是在今日的水蓮尾，而文獻、地圖的緯度值是錯的，實應以 Paulus Traudenius 之後的行程記錄為主來判斷其位置。關於 Sibilien 的位置，筆者需感謝與翁佳音先生的討論。

另外，二十世紀以來居住在水蓮尾（水埤）一帶的原住民可能與十七世紀的 Sibilien 不盡然有直接的關聯。除了移川與馬淵的記錄明載了 Tsiliwian 曾為其他村落、族群攻伐而遠走他處外。廖守臣與林建宏於 1982 年於水蓮尾一帶做口訪時，曾收得出生於 1909 年的 Tipos-Kolas 與 1914 年的 Modo-Larikid，兩位住民的口述記錄，兩報告人的祖父輩中有叫 Diway-Kalag（Sakiraya 的住民）、Komod-Hiyo（Sakiraya 的住民）和 Fakaway-Falah（薄薄社的住民）三人，曾於年輕時因逐鹿而追至海岸山脈山頂近今日水蓮尾之處。三人回村後曾建議村人一同移居水蓮尾拓墾，但是因後者是東賽德克族人（原文為泰雅人）出沒之獵場而作罷。等到清軍前來花蓮駐紮，賽德克人較少前來狩獵後，此三人才攜眾遷來，此時應該是 1875 年之後的事。之前據言水蓮尾一帶並無南勢阿美之跡。更早之前曾有來自今日豐濱一帶（即貓公社）的海岸阿美在此定居，留下住屋的痕跡。但是因為獵區的問題與賽德克人起過戰爭，遂又南遷。於此之後，在南勢阿美入遷之前，此處除一叫 Kototo 的華人外並無人在此定居。參閱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83-84。再則，1879 年印行的《臺灣輿圖》中的《後山總圖》，圖內僅有水蓮山的記載而無聚落名。參閱夏獻綸，《臺灣輿圖》（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45 種〔以下簡稱「文叢」〕，1959），頁 70。因此，十七世紀時的 Sibilien 在十九世紀中葉左右以前即可能已離開水蓮尾故地。有關二十世紀初阿美族中 Sibilien（Tsiwilian）離開水蓮尾故地的口碑，請參考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頁 414-421。

⁽³⁰⁾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0。

⁽³¹⁾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 83.

⁽³²⁾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頁 19。

8. Talleroma

有關 Talleroma 之記載始於 1643。⁽³³⁾ 目前已定論為位於花蓮吉安附近之南勢阿美舊社。⁽³⁴⁾ 中村孝志在其荷蘭代戶口表中將其比對為荳蘭、薄薄、里漏三社。⁽³⁵⁾ 此一說法恰與荷蘭文獻中 Linauw 出現與消失之時間相互為佐證。值得注意的是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日誌》中之地名索引 (index van geografische namen) 與地名表中，將 Talleroma 與 Terroma 混為一談。⁽³⁶⁾ 依據檔案文獻中 Terroma 出現之記錄將其比對後，其應為近臺東之一村，於 1645 年間應允臣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但在 1647 年又與公司進入落敵對狀態。⁽³⁷⁾ 按中村孝志之荷蘭時代戶口表以及 1655 年臺灣東部地方集會 (Oostelijke landdag) 記錄來對照，Terroma 可能為臺灣現行原住民分類中的魯凱族 (Ruaki) 之大南社。⁽³⁸⁾

9. Tiroo

僅出現於 Wesseling 於 1638 年呈報給臺灣長官之紀錄內，紀錄內言及在 Linauw 附近有一村落叫 Tiroo。關於 Tiroo 之敘述，因原稿老舊破損或字跡無法辨認而未再重新被排印於《臺灣日誌》中。其後也未曾再有關於 Tiroo 之敘述。⁽³⁹⁾ 其可能為 Linauw 或 Talleroma 之一小分社。

(三) 滿清時代漢文文獻中之聚落

滿清領臺時陸續有漢文文獻敘及花蓮一地。比較重要的文獻有高拱乾於 1694 年 (康熙三十三年) 著行之《臺灣府志》、周鍾瑄與陳夢林於 1717 年 (康熙五十六年) 的《諸羅縣志》、藍鼎元於 1722 年 (康熙六十一年) 的《東征集》、陳倫炯於 1730 年 (雍正八年) 在《海國聞見錄》中的〈臺灣後山圖〉、余文儀在 1764 年 (乾隆二十九年) 的《續修臺灣府志》、陳淑均在 1831 年 (道光十一

⁽³³⁾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頁 43。

⁽³⁴⁾ 中村孝志，〈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頁 97；〈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頁 19。

⁽³⁵⁾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0。

⁽³⁶⁾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672, 691.

⁽³⁷⁾ *Ibid.*, pp. 428, 511, 560, 593, 616.

⁽³⁸⁾ 中村孝志，〈一六六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臺灣風物》43：1 (1993 年 3 月)，頁 163；〈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4。

⁽³⁹⁾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pp. 417-418.

年)的《噶瑪蘭廳志》、羅大春在 1875 年(光緒元年)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沈葆楨在 1875 年(光緒元年)所呈報的《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夏獻綸在 1879 年(光緒五年)的《臺灣輿圖》和胡傳在 1894 年(光緒二十年)纂輯的《臺東州采訪冊》。⁽⁴⁰⁾ 現將其文內有關南勢阿美的記錄整理如下：

1. 直腳宣

又被記錄為竹腳宣、竹仔宣、七腳川等。在高拱乾的《臺灣府志》中，直腳宣被視為地標，言及直腳宣五社來指稱奇萊原野之村落。⁽⁴¹⁾ 在《諸羅縣志》、《東征集》、〈臺灣後山圖〉、《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臺灣輿圖》和《臺東州采訪冊》中一再被提及，⁽⁴²⁾ 為早期荷蘭時代之 Sicosuan。在《臺東州采訪冊》中之記錄內，有南勢阿美住民(原文為平埔南勢) 1,636 人。⁽⁴³⁾

2. 荳蘭

又被記錄為多難、斗難等。除高拱乾之《臺灣府志》外，上述所有的漢文文獻皆曾提及，⁽⁴⁴⁾ 為荷蘭時代之 Talleroma。在《臺東州采訪冊》中之記錄內有南勢阿美住民 1,563 人。⁽⁴⁵⁾

⁽⁴⁰⁾ 有關漢文文獻部份，仍有部份未列入本文討論之項。如收錄於《臺灣輿地彙鈔》內，鄭其照所著的〈臺灣番社考〉裡，也列出南勢阿美的筠椰椰、斗難、竹腳宣與薄薄等四個聚落。見鄭其照，〈臺灣番社考〉，收於《臺灣輿地彙鈔》(臺北：宗青，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 [33]，1995)，頁 38。此類文獻記錄多為抄錄當時代之前人著作，參考性較低，故未列入本文討論之項。

⁽⁴¹⁾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宗青，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 [2]，1995)，頁 15。

⁽⁴²⁾ 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臺北：宗青，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 [10]，1995)，頁 31；藍鼎元，《東征集》(文叢第 12 種，1958)，頁 90；施添福，《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三)》(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頁 127-129；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宗青，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 [7]，1995)，頁 81；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文叢第 308 種，1972)，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文叢第 29 種，1959)，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胡傳，《臺東州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36、66。

⁽⁴³⁾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36。

⁽⁴⁴⁾ 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31；藍鼎元，《東征集》，頁 90；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81；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66。

⁽⁴⁵⁾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

3. 薄薄

又被記錄為僕僕。在文獻記載上與荳蘭一樣，除高拱乾之《臺灣府志》外，上述所有的漢文文獻皆曾提及，⁽⁴⁶⁾ 在荷蘭時代也曾被統稱為 Talleroma 的一部份或為其從屬。⁽⁴⁷⁾ 在《臺東州采訪冊》中之記錄內，有南勢阿美住民 1,034 人。⁽⁴⁸⁾

4. 里漏

又被記錄為里留、理劉等。僅出現在陳淑均的《噶瑪蘭廳志》、羅大春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沈葆楨的《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夏獻綸的《臺灣輿圖》和胡傳的《臺東州采訪冊》內。⁽⁴⁹⁾ 為荷蘭時代之 Linauw。在《臺東州采訪冊》中之記錄內有南勢阿美住民 514 人。⁽⁵⁰⁾

5. 筠榔榔

又被記錄為巾老耶、根耶耶或根老爺，僅出現於在《諸羅縣志》、《東征集》、《續修臺灣府志》、《噶瑪蘭廳志》、《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和《臺灣輿圖》。⁽⁵¹⁾ 筠榔榔出現之年代恰與屬 Sakiraya 的竹窩社或 Takoboan 不在同一時間剖面。⁽⁵²⁾ 即 Sakiraya 此一聚落僅見於十七世紀，十八世紀

⁽⁴⁶⁾ 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31；藍鼎元，《東征集》，頁 90；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81；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66。

⁽⁴⁷⁾ 陳倫炯於 1730 年（雍正八年）在《海國聞見錄》中的〈臺灣後山圖〉裡面，則出現礁那女馬（即 Talleroma）與僕僕（即薄薄）並列的情況。見施添福，《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三）》，頁 127-129。對於薄薄在此一歷史時期與 Talleroma 並存現象的解釋，主要是證明了荳蘭（Matauran）在 Talleroma 體系內的核心地位。

⁽⁴⁸⁾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

⁽⁴⁹⁾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433。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66。

⁽⁵⁰⁾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

⁽⁵¹⁾ 周鍾瑄、陳夢林，《諸羅縣志》，頁 31；藍鼎元，《東征集》，頁 90；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81；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433；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

⁽⁵²⁾ 關於 Sakiraya 和 Takoboan 之關係，詳見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印行之《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或李亦園運用此書所寫有關南勢阿美歷史部份之著作。參閱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502-506；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7-148。廖守臣亦

以來到 1879 年則僅見筠榔榔或巾老耶，待到 1894 年胡傳之記載時只見竹窩社之分支歸化而未見巾老耶。⁽⁵³⁾ 廖守臣曾將歸化，即竹窩社，視同巾老耶。⁽⁵⁴⁾ 若巾老耶即為竹窩社，則有關 Sakiraya 在歷史文獻內出現之不連續性此一問題恰可獲得解決。

6. 歸化

僅見於十九世紀末葉之《臺東州采訪冊》，在記錄內有南勢阿美住民 397 人。⁽⁵⁵⁾ 其前身為竹窩社（Takoboan）。

7. 飽干

僅見於十九世紀末葉之《噶瑪蘭廳志》、《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臺灣輿圖》和《臺東州采訪冊》。⁽⁵⁶⁾ 在 1878 年（光緒四年）筠榔榔居民與滿清部隊交戰失利後，又加入部份戰敗後逃散的筠榔榔住民。⁽⁵⁷⁾ 在《臺東州采訪冊》中之記錄內有南勢阿美住民 539 人。⁽⁵⁸⁾

8. 脂脛脛

又被記錄為脛脛。僅見於十九世紀末葉之《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北路

於其未刊行之手稿《花蓮阿美族的部落遷徙與分佈》內釐清兩者間之關係：即 Sakiraya 內分為四個氏族集團：Takofoan、Sinsya、Todo 與 Lifo。Sakiraya 一般則稱 Takofoan。參閱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40。Takofoan 為 Takoboan 的另一拼法。

⁽⁵³⁾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66。1878 年（光緒四年）竹窩社居民與滿清部隊交戰失利後，曾四散它方。與滿清議和後有部份居民又聚回原居地，此時竹窩社則被滿清易名為歸化。參閱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505；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7。

⁽⁵⁴⁾ 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38-43。

⁽⁵⁵⁾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66。

⁽⁵⁶⁾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433；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66。

⁽⁵⁷⁾ 李亦園誤將飽干視為 Sakiraya 於 1878 年加禮宛事件後所建。見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7。但飽干早已出現在編於 1831 年的《噶瑪蘭廳志》中，當時名為罷鞭。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433。飽干實為薄薄內的四個小社：Rarivoh、Taratsan、Paralits 與 Tsipaokan 中的 Tsipaokan。見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93。

⁽⁵⁸⁾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

中路開山情形摺》、《臺灣輿圖》和《臺東州采訪冊》。⁽⁵⁹⁾ 據言毘毘是移自花蓮溪口南方海岸一帶的 Tsiporan 此氏族，後又混入 Sakiraya 之住民。⁽⁶⁰⁾ 在《臺東州采訪冊》中之記錄內有南勢阿美住民 221 人。⁽⁶¹⁾

(四) 十九世紀末日文與英文文獻中之聚落

日本領臺於 1895 年（明治二十八年）。此時段有關十九世紀末葉南勢阿美群聚落之描述較重要之文獻是田代安定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編纂，原印行於 1900 年（明治三十三年）的《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以及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原印行於 1896 年的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⁶²⁾ 現將其文內有關南勢阿美的記錄整理如下：

1. 七腳川

同前述之直腳宜，田代安定之調查在當時之非華人（原文為支那人）住民有 1,628 人。⁽⁶³⁾ 馬偕稱七腳川為 Chhit-kha-chhoan，估算其當時之人口為多於一千人。⁽⁶⁴⁾

2. 豆蘭

同前述之荳蘭，田代安定之記錄中非華人之住民有 1,431 人。⁽⁶⁵⁾

3. 薄薄

同前述之薄薄，記錄中非華人人數有 1,049 人。⁽⁶⁶⁾

4. 里留

同前述之里漏，記錄中非華人人數有 592 人。⁽⁶⁷⁾

⁽⁵⁹⁾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6、66。

⁽⁶⁰⁾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7。

⁽⁶¹⁾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6。

⁽⁶²⁾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民課；臺北：成文，1985）；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⁶³⁾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3-254。

⁽⁶⁴⁾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p. 246-247.

⁽⁶⁵⁾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4。

⁽⁶⁶⁾ 同上註，頁 254。

5. 魁魁

同前述之脂魁魁，記錄中非華人人口有 125 人。⁽⁶⁸⁾

6. 飽干

同前述之飽干，記錄中非華人人口有 505 人。⁽⁶⁹⁾

7. 歸化

為前述之 Sakiraya 或竹窩社於 1878 年後之稱謂，非華人人口有 360 人。⁽⁷⁰⁾

透過上述不同歷史時期的文獻資料的整理對南勢阿美群聚落名稱的變化，可以獲得較清晰的瞭解（表一）。

（五）其它原住民族群之聚落——哆囉滿人

哆囉滿人在十七世紀時曾出現於西班牙與荷蘭文獻中，西文稱其聚落為 Turoboan。Turoboan 此一稱謂也曾被西班牙人取來用為分區所轄之部份臺灣領地的三省區中之一省區名，其所含之地理範圍約略等於今日之花蓮縣的平地地區。⁽⁷¹⁾ 荷蘭文獻中之記載則將哆囉滿記載為 Tarraboan，其村落之位置約在今日之立霧溪河口北側。⁽⁷²⁾ 值得注意的是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臺灣日誌》中的地名索引，曾將在 1648 年地方集會記錄中，位於南臺灣 Cavado 村續任之公司派令住民首領之一 Tarrabuan（人名）誤為 Tarraboan 此一村落。⁽⁷³⁾ 至於漢籍文獻方面，哆囉滿以村落的名義僅出現於印行於 1694 年的《臺灣府志》。⁽⁷⁴⁾ 隨後則不再有文獻之記載。⁽⁷⁵⁾

⁽⁶⁷⁾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5。

⁽⁶⁸⁾ 同上註，頁 255。

⁽⁶⁹⁾ 同上註。

⁽⁷⁰⁾ 同上註，頁 256。

⁽⁷¹⁾ Borao,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 p. 103.

⁽⁷²⁾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

⁽⁷³⁾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M., 1996), pp. 19, 667.

⁽⁷⁴⁾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15。

⁽⁷⁵⁾ 哆囉滿在 1694 年的漢籍文獻中雖然曾再出現過，如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的《番境補遺》、康熙末年刊於乾隆元年的《番俗六考附載》、1741 年（乾隆六年）的《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等。但此時文

表一 十七至十九世紀南勢阿美以及與南勢阿美有關連的聚落名稱變動表

| 年代 | 1630s | 1630s-50s | 1694 | 1717 | 1722 | 1730 | 1764 | 1831 | 1875 | 1879 | 1894 | 1900 | |
|------------------|------------------|----------------|-----------|-------------|-------------|-------------|------------------|-------------|--------------|--------------|-------------------|-----------------------|------------------|
| 聚 落 名 稱 | | Kipormowa | | | | | | | | | | | |
| | | Linauw | | | | | | 李劉 | 理劉 | 理劉 | 里留 (里漏) | 里留 | |
| | | Parrapoure | | | | | | | | | | | |
| | | Saquiraya | Sakiraya | | 筠榔榔 | 筠榔榔 | | 筠榔榔 | 根耶耶 | 根老爺 | 巾老耶 | 歸化 | 歸化 |
| | | Chiulien | Sibilien | | | | | | 罷鞭 | 飽干 | 飽干 | 飽干 | 飽干 |
| | | Chicasuan | Sicosuan | 直腳宣 五社 | 竹腳宣 | 竹腳宣 | 即加宣 | 竹子宣 | 直腳宣 | 七腳川 | 七腳川 | 七腳川 | 七腳川 |
| | | | Takilis | | | | | | | | | | |
| | | Tataruman | Talleroma | | 多難 | 斗難 | 礁那 女馬 | 多難 | 豆難 | 斗難 | 斗難 (豆蘭) | 荳蘭 | 豆蘭 |
| | | | | | 薄薄 | 薄薄 | 僕僕 | 薄薄 | 薄薄 | 薄薄 | 薄薄 | 薄薄 | 薄薄 |
| | | | Tiroo | | | | | | | | | | |
| | | | | | | | | | | 脂魁魁 | 脂魁魁 | 魁魁 | 魁魁 |
| | 資 料 來 源 | 出處 | 西班牙 文獻 | 荷蘭 文獻 | 臺灣 府志 | 諸羅 縣志 | 東征集 | 臺灣後 山圖 | 續修臺 灣府志 | 噶瑪蘭 廳志 | 臺灣海 防並開 山日記 | 臺灣 輿圖 | 臺東州 采訪冊 |
| 作者 | | J. B. Borao | [說明1] | 高拱乾 | 周鍾瑄 陳夢林 | 藍鼎元 | 陳倫炯 | 余文儀 | 陳淑均 | 羅大春 [說明2] | 夏獻綸 | 胡傳 (鐵花) | 田代 安定 |
| 頁數 | | 1993: 103 | | 1995: 19 | 1995: 31 | 1958: 90 | 1994: 127-129 | 1995: 81 | 1993: 433 | 1972: 47 | 1959: 77 | 1993: 35-36, 66 | 1985: 253-256 |

說明 1：荷蘭時代各聚落之資料出處，請參閱前文「二、荷蘭文獻中之聚落」章節中有關各聚落記錄之資料來源。

說明 2：沈葆楨 1875 年的《福建臺灣奏摺》內的聚落資料，因係根據羅大春 1875 年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所有有關南勢阿美的聚落數及名稱都雷同，故表中不再列出。參閱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

獻記載的重點是強調哆囉滿作為一產金地，哆囉滿作為一聚落的記錄反而缺乏。在臺灣地名研究的脈絡裡，因常有地名是引自當地或當地附近的原住民聚落名，隨後此原住民聚落可能已不存在，但當地的地名仍然繼續延用此名稱。哆囉滿人到底在哆囉滿一地居住到何時方始離去，較合理的推測是應該要與太魯閣人沿今日之立霧溪東遷有關。但是本文為了嚴謹起見，在不妨礙、扭曲本文主要論證重點的原則下，暫將哆囉滿以村落名義出現的年代僅止於十七世紀末葉。

哆囉滿人一般被認為與蘭陽平原上的哆囉美遠人 (Torobiawan) 有親屬關係。⁽⁷⁶⁾ 在 Pieter Boon 於 1643 年的東臺灣探金日誌中，即曾提及哆囉滿人曾因聽信 Cabelangh (噶瑪蘭) 來的住民之語，而曾對 Pieter Boon 探金隊一行採取較保留的態度。⁽⁷⁷⁾ 在哆囉美遠人二十世紀初的口傳歷史中，也曾述及其祖先曾居住在今日的立霧溪河口以北一地，後因太魯閣人的時常出沒來出草，而避遷於今日之蘭陽平原。⁽⁷⁸⁾ 不過在荷蘭時代哆囉美遠 (Taloebayan) 即已出現在 1648 年與 1650 年的噶瑪蘭村落戶口表中。⁽⁷⁹⁾ 而哆囉滿在文獻中的消失是在十八世紀。意即至少在十七世紀時兩村落曾同時並存過。待至十八世紀太魯閣人日漸沿今日之立霧溪而下時，哆囉滿人方被迫遷離立霧溪河口以北一帶。⁽⁸⁰⁾

(六) 其它原住民族群之聚落——加禮宛人

加禮宛人之出現在花蓮一帶是十九世紀中葉之事。在移入花蓮以前，加禮宛人原是屬居住在現今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因為自從 1796 年 (嘉慶元年) 吳沙率領漢籍墾民進入蘭陽平原拓殖後，噶瑪蘭人即在其原居地日漸遭受漢勢力的侵擾。1812 年 (嘉慶十七年) 蘭陽平原正式列入滿清行政所轄之版圖。隨著華人勢力不斷地入侵，部份尚未被華人社會、文化所吞沒的噶瑪蘭人乃於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南遷花蓮一帶。移民者中以加禮宛社人口最多，且在移出時大多是由加禮宛港 (今日的宜蘭縣冬山河與蘭陽溪會口一帶) 出海，因而在移至花蓮後被統稱為加禮宛人。⁽⁸¹⁾ 此即為花蓮附近加禮宛人聚落之由來。

⁽⁷⁶⁾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頁 20-23。

⁽⁷⁷⁾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140-141.

⁽⁷⁸⁾ 詹素娟，〈Sanasai 傳說圈的平埔族群歷史圖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1996 年 6 月 28-29 日，頁 9、12-13。

⁽⁷⁹⁾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7。

⁽⁸⁰⁾ 西班牙教士 De los Angeles 在一六三〇年代末期曾提及哆囉滿人熟悉巴塞語 (Bassay)，一種在當時通行於臺灣東北部的通用貿易語。參閱 Borao,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 p. 117. 在整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蘭陽平原與花蓮以北一處，哆囉美遠人亦是少數幾個異於噶瑪蘭人而能知曉巴塞語者。參閱詹素娟，〈Sanasai 傳說圈的平埔族群歷史圖像〉，頁 17-18。

⁽⁸¹⁾ 詹素娟，〈歷史轉折期的噶瑪蘭族——十九世紀的擴期與變遷〉，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1997 年 5 月 16-17 日，頁 32。

有關在花蓮一帶加禮宛人之聚落，曾出現在 1875 年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和《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1879 年之《臺灣輿圖》、1894 年的《臺東州採訪冊》、1896 年的 *From Far Formosa*，以及 1900 年的《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⁸²⁾ 文獻所載之年代大約與加禮宛人在花蓮一帶建立聚落之時間相當。而 1878 年（光緒四年）俗稱的加禮宛事件——即清軍入侵花東縱谷的北路營中一名叫陳輝煌的軍功，因加禮宛人不滿其漁肉鄉民而擊起兵對抗滿清的統治，但隨後為增援之清軍所擊敗之事件——後加禮宛人在花蓮一帶之聚落即被解體。剩餘之住民大部份被打散發配南方。⁽⁸³⁾ 在《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與《臺灣輿圖》內加禮宛人之聚落統稱為加禮宛六社，內有加禮宛、竹仔林、武暖、七結仔、談仔秉與瑤歌。⁽⁸⁴⁾ 但加禮宛事件後之記錄，即《臺東州採訪冊》中僅餘加里宛（即加禮宛）、竹仔坑（即竹仔林）、武暖、七結（即七結仔）與瑤局（即瑤歌）。談仔秉不再出現。此時聚落內的住民也不完全是加禮宛人，僅知是華人與原住民混居之聚落。⁽⁸⁵⁾ 《臺東州採訪冊》內之記載中關於聚落部份同等於馬偕於 1890 年採訪所得（馬偕之書則稍後印行於 1896 年），也與田代安定隨後之調查所得紀錄吻合。⁽⁸⁶⁾ 現將加禮宛人之聚落整理如下表表二。

⁽⁸²⁾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胡傳，《臺東州採訪冊》，頁 38；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232；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48。

⁽⁸³⁾ 吳親恩、張振岳，《人文花蓮》（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1995），頁 133-136；胡傳，《臺東州採訪冊》，頁 66-68；藤崎濟之助，《臺灣的蕃族》（臺北：南天，1988），頁 502-503。另一說法是，清軍在加禮宛事件後將招撫來的九百餘名加禮宛人安置在原加禮宛社北方里許之處，而並非被打散發配南方。參閱吳贊誠，《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文叢第 231 種，1966），頁 29-30；詹素娟，《歷史轉折期的噶瑪蘭族》，頁 32。

⁽⁸⁴⁾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7。

⁽⁸⁵⁾ 胡傳，《臺東州採訪冊》，頁 38。

⁽⁸⁶⁾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232；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48。

表二 十九世紀末葉加禮宛人之聚落名稱變動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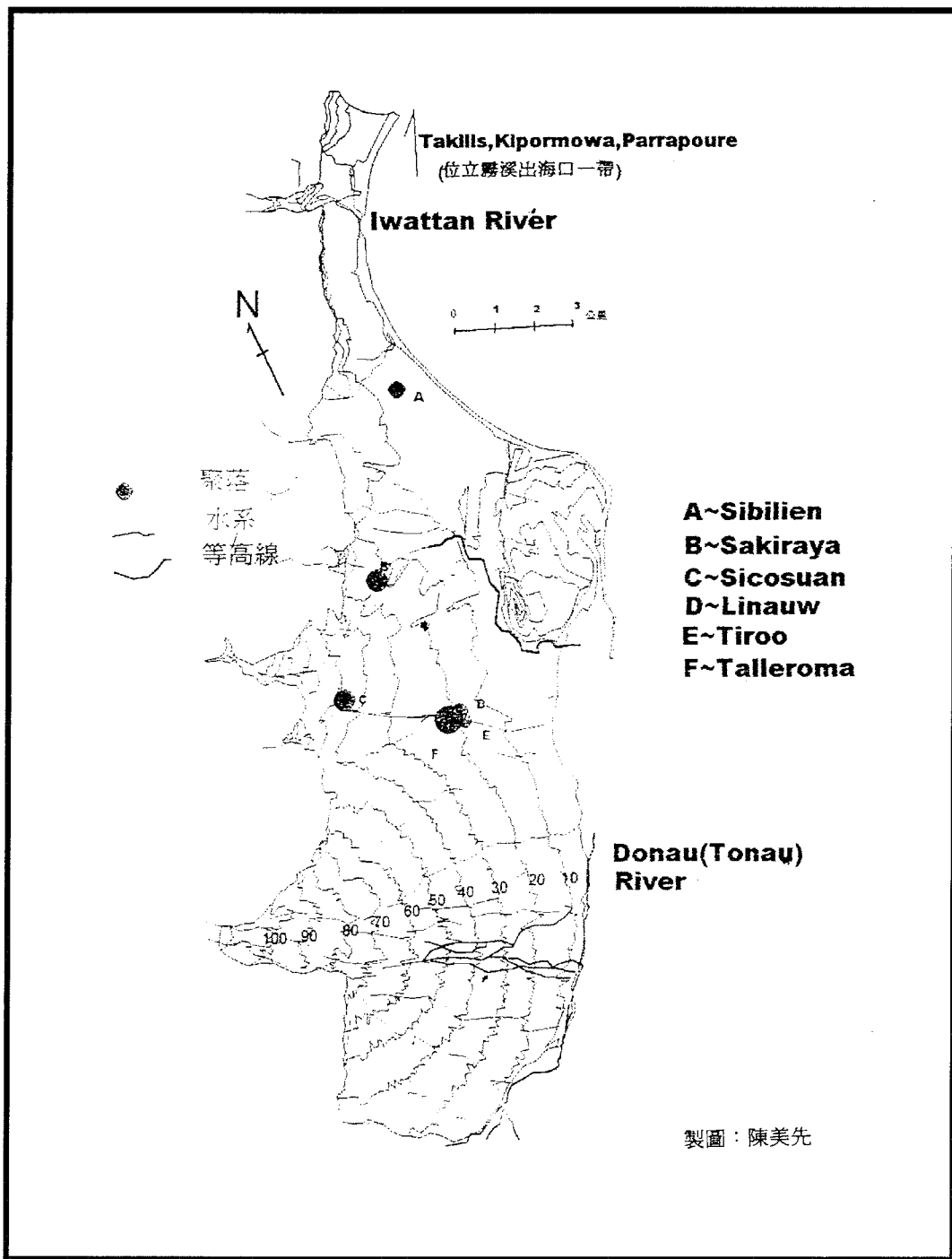
| 年代 | 1875 | 1880 | 1890 | 1894 | 1900 | |
|------------------|------|---------------|------------|------------------|----------|---------------|
| 聚 落 名 稱 | 加禮宛 | 加禮宛 | Toa-sia | 加禮宛 | 加禮宛本庄 | |
| | 竹子林 | 竹子林 | Tek-a-na | 竹子坑 | 竹林庄 | |
| | 武暖 | 武暖 | Buk-loan | 武暖 | 武暖庄 | |
| | 七結仔 | 七結仔 | Chhit-kiet | 七結 | 七結庄 | |
| | 瑤歌 | 瑤歌 | Ian-ko | 瑤歌 | 瑤高庄 | |
| | 談仔東 | 談仔東 | | | | |
| 資 料 來 源 | 出處 | 臺灣海防並開山 日記 | 臺灣輿圖 | From Far Formosa | 臺東州采訪冊 | 臺東殖民地 豫察報文 |
| | 作者 | 羅大春 | 夏獻綸 | G. L. Mackay | 胡傳 | 田代安定 |
| | 頁數 | 1972: 47 | 1959: 77 | 1991: 232 | 1993: 38 | 1985: 248 |

說明：沈葆楨 1875 年的《福建臺灣奏摺》的聚落資料，係根據羅大春於 1875 年的《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表中不再列出。⁽⁸⁷⁾

上述有關南勢阿美以及與南勢阿美相關連的聚落在十七世紀之聚落分佈圖，係取材自 1904 年（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完成的堡圖集中所明載之南勢阿美聚落地理位置，⁽⁸⁸⁾ 然後再配合十七世紀文獻的記載作修正。圖一即是十七世紀花蓮一帶南勢阿美之聚落約略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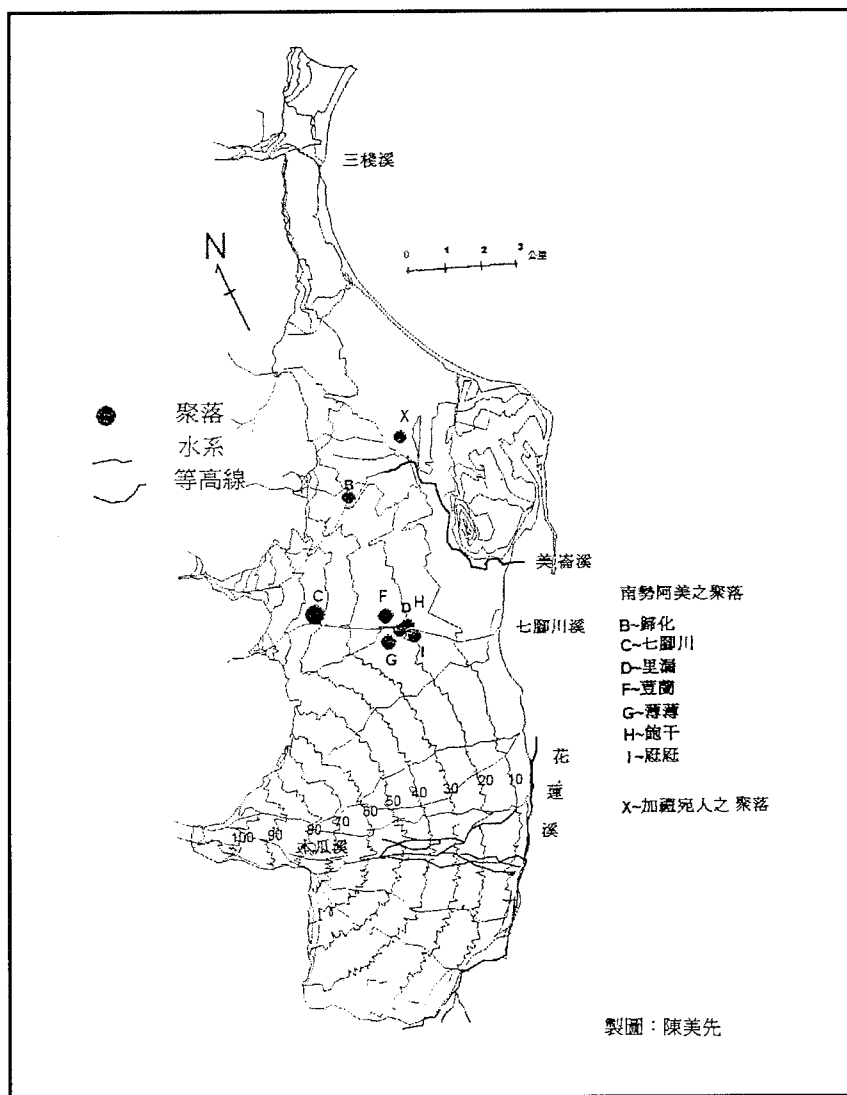
⁽⁸⁷⁾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

⁽⁸⁸⁾ 施添福，〈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收於張炎憲、陳美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頁 159-163。



圖一 十七世紀花蓮一帶之聚落分佈圖

上述有關南勢阿美以及加禮宛人在十九世紀末葉之聚落分佈圖，係取材自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製完成的堡圖中所明載之加禮宛聚落地理位置。⁽⁸⁹⁾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之聚落空間分佈是1878年俗稱的加禮宛事件後之分佈概況。圖二即是依據原比例尺為二萬分之一的堡圖內之分佈位置描繪而成。



圖二 十九世紀末花蓮一帶南勢阿美以及加禮宛人之聚落分佈圖

⁽⁸⁹⁾ 施添福，〈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頁159-163。

三、南勢阿美群人口結構之演變

有關南勢阿美群之人口數，最早可推至沈葆楨於 1875 年（光緒元年）所呈報的《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內對南勢阿美所統計的人口數，當時所計算的人口數是 7,704 人。⁽⁹⁰⁾ 馬偕於 1890 年至花蓮佈教時也對南勢阿美的人口做了預估，大約 4,000 餘人。⁽⁹¹⁾ 至於曾對各村落人口做較精確的統計數據，則是出自印行於 1894 年的《臺東州采訪冊》與 1900 年的《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⁹²⁾ 現將其整理如表三：

表三 十九世紀末南勢阿美群聚落人口統計表

| 年代 | 聚落名稱 人口 | 里漏 | 歸化 | 飽干 | 七腳川 | 荳蘭 | 薄薄 | 魁魁 | 南勢阿美 合計 |
|------|-------------|------|-------|-----|-------|-------|-------|-------|------------|
| | | 1894 | 人口數合計 | 514 | 397 | 539 | 1,636 | 1,563 | |
| | 戶數 | 106 | 93 | 122 | 314 | 321 | 248 | 45 | 1,249 |
| | 每戶平均 人口數 | 4.8 | 4.3 | 4.4 | 5.2 | 4.9 | 4.2 | 4.9 | 4.7 |
| 1900 | 人口數合計 | 592 | 360 | 505 | 1,628 | 1,431 | 1,049 | 125 | 5,690 |
| | 戶數 | 92 | 84 | 110 | 360 | 354 | 338 | 33 | 1,371 |
| | 每戶平均 人口數 | 6.4 | 4.3 | 4.6 | 4.5 | 4.0 | 3.1 | 3.8 | 4.2 |
| | 男性人口數 | 300 | 180 | 243 | 832 | 721 | 542 | 59 | 2,877 |
| | 女性人口數 | 292 | 180 | 262 | 796 | 710 | 507 | 66 | 2,813 |
| | 男女性別比 | 103 | 100 | 93 | 105 | 102 | 107 | 89 | 102 |

說明 1：1894 年有關人口數合計與戶數資料取自《臺東州采訪冊》，參閱胡傳，《臺東州采訪冊》（1993），頁 35-36、66。

說明 2：1900 年有關男性、女性人口數合計與戶數資料，取自《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參閱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1985），頁 253-256。村落人口數中，不包含華人住民（原文為支那人）。男女性別比為每一百名女性所對應之男性人口數。

⁽⁹⁰⁾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

⁽⁹¹⁾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 226.

⁽⁹²⁾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35-36；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4-256。

沈葆楨在 1875 年有關南勢阿美的人口資料會比後期的人口資料多了將近二千餘人左右，可能與 1878 年爆發的加禮宛事件有關。此事件中被清軍攻擊的住民除了加禮宛人外，與加禮宛人聯合一同抵抗清軍，屬南勢阿美的巾老耶亦被波及。吳贊誠在 1878 年加禮宛事件後所呈報的「官軍攻毀後山番社並搜除安撫情形摺」內，即載明加禮宛人與巾老耶住民共被屠殺二百餘人。同屬南勢阿美的七腳川村民，則於巾老耶村民戰事失利後出擊截殺敗逃的後者。呈報的奏文中又提及太魯閣人也前來幫助清軍作戰。⁽⁹³⁾ 巾老耶乃為 Sakiraya 之漢譯，自十七世紀以來即與七腳川、Talleroma（荳蘭、薄薄、里漏之統稱）合為南勢阿美的主要村落。在文獻記載中其紀錄大都一直保持著歷史的持續性（historical continuity）。比起其它人口數較少，且在不同時期有被文獻記載所遺漏的村落，Sakiraya、七腳川、Talleroma 的村落人口數似應該較旗鼓相當。再則依據十九世紀中末葉入墾十六股一地的華人住民後裔的口傳，華人當時前來墾殖時，其聚落地點是位在加禮宛、竹篙滿（即竹窩社或巾老耶）與七腳川三大原住民村落間，族群間的張力相當緊張。由此可略為推測在 1878 年前時巾老耶村落的人口數應該與七腳川的人口數不相上下。若回過頭來看表三，歸化（即 1878 年後的巾老耶）的人口數在加禮宛事件後僅有四百人不到，而七腳川仍擁有一千六百餘人，中間一千兩百餘人的差距應該可解釋成加禮宛事件後未歸於原居地，被清軍逐往南方的人口。⁽⁹⁴⁾ 由此可約略知道南勢阿美在十九世紀中葉花蓮一帶的人口大概有近 7,700 餘人。至於十七世紀時南勢阿美的人口數，可由間接預估來推算。首先，我們需先了解當時南勢阿美的經濟生活型態。

在十九世紀中末葉水田稻作傳入今日之花蓮一帶前，南勢阿美的經濟活動應以漁撈、狩獵和農耕為主。⁽⁹⁵⁾ 從十七世紀的荷蘭文獻中，特別是對南勢阿美所在地著墨最多的上尉 Pieter Boon 的東臺灣探金隊日誌中，我們可約略了解南勢阿

⁽⁹³⁾ 吳贊誠，《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頁 21-23。

⁽⁹⁴⁾ 此點推論與廖守臣收錄的口訪記載中 Sakiraya 人於加禮宛事件後被流放南方乙事相吻合。參閱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43、44。李亦園亦曾將鮑干歸為是加禮宛事件後散至薄薄附近的 Sakiraya 人所建之村落。參閱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7。但早在加禮宛事件之前，沈葆楨在 1875 年即已經同時記載了巾老耶與鮑干。參閱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頁 33。換言之，兩村落是在加禮宛事件前就已同時存在。也就是說，表四中鮑干的人口（約五百餘人）並不完全為巾老耶村民。

⁽⁹⁵⁾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75-177。

美當時生活領域的自然生態。在 1643 年 5 月 5 日探金隊一行離開立霧溪口的哆囉滿南行橫跨 Iwattan 河（今日之三棧溪）後，約在午時三時抵達 Zacharija（即 Sakiraya）。從後者到 Talleroma 則需經過兩條主河流與五至六條支流，探金隊一行在當日傍晚即可抵達。一行人因不受到 Talleroma 住民之歡迎，而在當日晚又趕往 Tonauw 河。⁽⁹⁶⁾ 隔日一早探金隊繼續南行，沿途遭遇了數條溪流，水深且急，傍晚才抵達一叫 Pisanang 的村落（今日之鳳林鎮平林一帶）。⁽⁹⁷⁾ 很明顯地，上文中所提及有關南勢阿美的村落是處於一溪水密佈的環境。Zacharija 與 Talleroma 間的溪流可能包括了今日之美崙溪與吉安溪早期之支流（現多已部份淤塞或填實轉為平地，如七腳川溪）。換言之，溪河裡的漁撈是與南勢阿美的經濟生活互為相關的。

其實，不只是溪河漁撈，近海漁撈也應是南勢阿美所擅長且賴以為生的經濟活動之一。在荳蘭與薄薄村民的口傳歷史中即有敘及其祖先是漂流自海外的傳說。里漏的村民在 Talleroma 體系中則是專司捕漁之工作。⁽⁹⁸⁾ 連位居內陸的 Sakiraya 也曾有傳說其祖先曾以拾貝為食。⁽⁹⁹⁾ 在宗教儀式方面，Talleroma 則有與漁獲有關的活動。像在成年禮中（南勢阿美語稱為 misral），荳蘭村民有一叫 malik'ap 的漁祭，是為於捕漁前後向河神作祭祈福與感謝。里漏村民在成年禮儀式中也有一叫 paihsin to kavi δ 的漁神祭活動。⁽¹⁰⁰⁾ 這些都說明了漁撈與南勢阿美，特別是 Talleroma 的關係。

狩獵與農耕亦是南勢阿美重要的經濟活動。Talleroma 的口傳神話中即有一叫 toa-aps 的先人教授並命荳蘭與薄薄兩村村民專司狩獵與農耕。⁽¹⁰¹⁾ 成年禮中，里漏村村民亦有一叫 paihsin to malatao 的獵神祭。⁽¹⁰²⁾ 口傳中亦有族人因逐鹿而至今

⁽⁹⁶⁾ 探金隊一行的駐紮處，可能為位今日之木瓜溪沖積扇上一注入花蓮溪的大河，可能為木瓜溪之一古網狀河。

⁽⁹⁷⁾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140-141.

⁽⁹⁸⁾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4-145；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94。

⁽⁹⁹⁾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7-148；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502。

⁽¹⁰⁰⁾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64-166。

⁽¹⁰¹⁾ 同上註，頁 144。

⁽¹⁰²⁾ 同上註，頁 166。

日之水蓮尾一帶。⁽¹⁰³⁾ 至於農耕方面，在里漏村的傳說中，早期荳蘭、薄薄兩村村民還需種植夠量的粟，以便與前者交換魚貨和鹽。⁽¹⁰⁴⁾

至於上述三種經濟生活方式，到底何者為主，可能依村落不同而異。如里漏較傾向於漁撈；荳蘭與薄薄可能較能兼顧這三者。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華人所擅長的水田稻作在早期應不存在，此點可從以下兩個事實中佐證。

第一，南勢阿美的聚落分佈，除了里漏與𧄂𧄂的地理位置在海拔 20 公尺以下，屬沖積扇上的湧泉帶外，其餘大多位在較高的海拔位置（參照圖一、二）。湧泉帶的特色是水泉豐富但排水良好，適合水稻耕作。⁽¹⁰⁵⁾ 南勢阿美之聚落大多不在此區，而位在此區的里漏是以漁撈和製鹽為主要經濟活動。⁽¹⁰⁶⁾ 𧄂𧄂的出現則是在十九世紀，傳說是來自海岸阿美，善製陶器。因部份其它村落將此技術視為禁忌，故多拿穀物與其交換。⁽¹⁰⁷⁾ 因此，此兩聚落住民務農之動機下降，更何況從事需投入大量勞動力的水田栽植。第二，1851 年（咸豐元年）黃阿鳳為首的一批華人墾民前來花蓮一帶拓殖時，直接就進入了當時並無聚落存在的湧泉帶，而建立了十六股此一華人聚落。若鄰近的 Sakiraya 與 Sicosuan 從事水田栽植，則應不會讓出此片地區給予前來之華人拓殖。

在農耕方面，實際上，遊耕耕作幾乎是為臺灣南島語族在與華人精密水田栽植接觸前的一耕作常態。此點特別適用於十七世紀時的臺灣。⁽¹⁰⁸⁾ 在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在其轄臺灣時鼓勵對土地採恆久性的耕作（permanent cultivation）方式，以求取獲得較多單位土地上的量產。當其勢力進入東臺灣時，也曾企圖鼓勵當地之住民採較恆久性耕種，較明顯的例子即是在今日的臺東一帶獎勵農作。若南勢阿美在十七世紀時早已採恆久性的土地耕作方式，大概不會被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文獻所遺漏。但是事實是荷蘭檔案中並沒有對南勢阿美有此紀錄。

⁽¹⁰³⁾ 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83-84。

⁽¹⁰⁴⁾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4。有關南勢阿美經濟活動之記錄，大多摘自李亦園之文章，其記錄多以 Talleroma 此一體系為主。Sakiraya 與 Sicosuan 較少著墨。

⁽¹⁰⁵⁾ 施添福，《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資料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21。

⁽¹⁰⁶⁾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4-145。

⁽¹⁰⁷⁾ 同上註，頁 147；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92-493。

⁽¹⁰⁸⁾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3.

對土地採行遊耕耕作 (swidden cultivation) 的生產方式，其人口密度約略不能大於 Stuart A. Schlegel 所設定的土地對住民行遊耕耕作所能支持的承載值，即每平方公里 50 人。⁽¹⁰⁹⁾ 換言之，我們可由南勢阿美人口生活圈的範圍大小來推估出其人口數的約略上限值。依南勢阿美處於平原而居的習性，而只計算其聚落附近平原地區的面積，約可估得 100 平方公里。⁽¹¹⁰⁾ 也就是說，在十七世紀時其人口數不能高於 5,000 人。若超過此數值，必無法維持遊耕耕作，而須改採對土地較精密的耕作方式方能支撐其人口數。

李亦園曾運用中村孝志所編整的荷蘭時代戶口表，推估十七世紀時南勢阿美的人口數可能約為十九世紀末葉的一半左右。⁽¹¹¹⁾ 也就是說 3,000 人左右的人口數是一可能被接受的數值。無論如何，在荷蘭文獻中，有關南勢阿美人口的說法，以已出版刊行的資料為準，可能就只有 1643 年，為呼應 Pieter Boon 一行的採金活動，Jan Oloffz. 與 Simon Cornelisz. 領的基隆 (Quelang)、Alckmaer 與希望號 (Goede Hoop) 等此一船隊因東北季風而又途經過 Tarraboang (哆囉滿，即今日之立霧溪口一帶)，在 Danau 河 (今日的花蓮溪、木瓜溪交會近海口一帶之處) 附近曾在山上見一村，以及許許多多的人在岸邊走動，⁽¹¹²⁾ 實際的人口數值不得而知。表四表示南勢阿美在不同時期的人口數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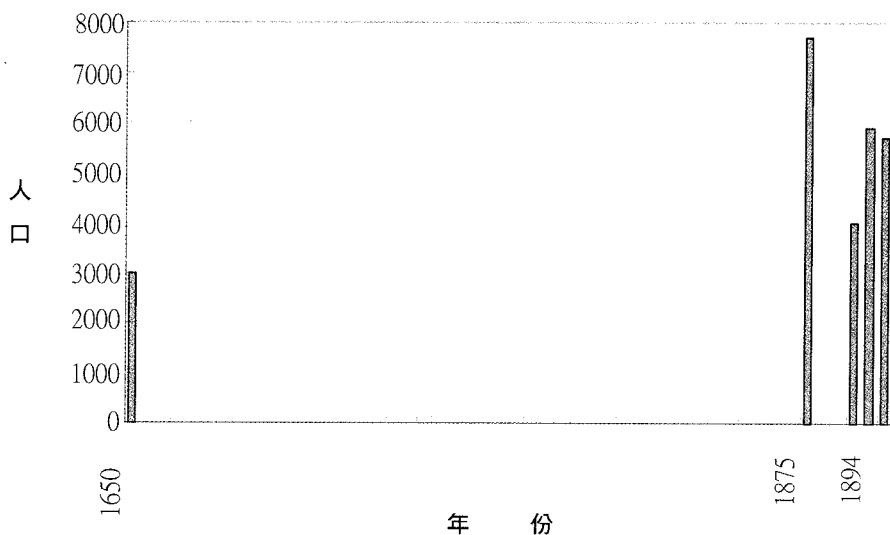
⁽¹⁰⁹⁾ Stuart A. Schegel, *Tiruray Subsistenc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69;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 33.

⁽¹¹⁰⁾ 南勢阿美人口的生活圈，約略等於今日花蓮縣境內的新城鄉、花蓮市與吉安鄉 (由北至南) 三行政區，其所轄行政範圍的面積依次約略為 30、30 與 65 平方公里。三行政區面積總和約為 125 平方公里。在今日位木瓜溪以北，已發展為聚落的平原地區的總面積約為 100 平方公里 (原統計資料稱之為聚居地)。因上述三行政區的平原地區在今日已多成為都市用地與其外圍，且統計資料中，聚居地的面積是包括其所屬行政疆界內的總面積，故對平原地區面積的數值應不會低估。參閱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臺北：行政院主計處，1993)，頁 102-107。

⁽¹¹¹⁾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76-177。荷蘭時期南勢阿美的戶口表中，只有村落名稱而無人口數的統計。參閱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0。李亦園是以臺東為中心，以卑南阿美在荷蘭時代的平均戶口數與戰後初期的平均戶口數做一比較，而推估出十七世紀時平均每村人口數，約為戰後初期時之一半。因戰後初期南勢阿美的人口數與十九世紀末《臺東州采訪冊》內的人口數相近，故可略推十七世紀時南勢阿美的人口是遠低於十九世紀末葉的。不過，李亦園的預估法是必須站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間二百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卑南阿美與南勢阿美人口結構演變過程是相似或甚至是一樣的假設上，方能成立。

⁽¹¹²⁾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 134.

表四 南勢阿美人口數



資料來源：1875 年：參閱沈葆楨，《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1959），頁 33。

1890 年：參閱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1991, p. 226.

1894 年：參閱胡傳，《臺東州采訪冊》（1993），頁 35-36。

1900 年：參閱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1985），頁 254-256。

說明：1600 年與 1890 年之人口數值為預估值。

由表四可概略地得知南勢阿美的人口由十七世紀以來逐漸增至七千餘人。但是 1878 年的加禮宛事件使得南勢阿美的 Sakiraya 在花蓮地區的人口銳減。至十九世紀末葉時僅餘六千人不到。

從表三中又可得南勢阿美在十九世紀末以村落為單位的人口結構（population structure）。以男女性別比為例，其比值為 102，比起一般常態社會的數值 100 來說是偏高。若在細察其個別村落的性別比，里漏、七腳川、荳蘭與薄薄的比值分別為 103、105、102 與 107，都偏離常態比值太高。歸化則恰為 100，飽干和魁魁則分別為 93 和 89。

造成此種所有平均值偏高的可能，應該與女性人口外流有關。依人類學的資料，南勢阿美為一典型母系社會，女性在親族社會中有著較高的優勢地位，男性則是處於從屬的情況。⁽¹¹³⁾ 換言之，在其社會中不會有諸如部份父系社會有在經濟危機時殺女嬰的習俗，也未見任何文獻有此方面的記載。因此較適當的解釋方式應該是女性人口外流。可能是如同較早期臺灣西部平原的平埔族，其女性人口在面臨大量男性華人移入人口時，會產生相互通婚的現象，因而促使原住民人口中女性人口的銳減。至於為何歸化、飽干和厝厝的性別比值偏低，可能與 1878 年的加禮宛事件有關。歸化是曾參與加禮宛事件一同抗清的 Sakiraya 於事敗後的稱呼，其男性人口在戰爭中減少應是可預期的。飽干和厝厝則據言有加禮宛事件後的 Sakiraya 人移入，⁽¹¹⁴⁾ 此為兩村所共有之特色。若兩者偏低的性別比值是 Sakiraya 移入人口所造成，則似乎暗示著，相對於男性而言，有不少的 Sakiraya 女性人口於事件後離開原居地而遷入飽干和厝厝。⁽¹¹⁵⁾

表三也能提供另一有關人口結構的資料，即 1894 年到 1900 年間戶口數與每戶平均人口數的變化。表中一明顯的趨勢是這六年間南勢阿美的總戶口數從 1,249 成長至 1,371，六年來成長了近一成。但是其每戶平均人口數卻從 4.7 降為 4.2，六年來下降了約一成。也就是說，此段期間在花蓮一帶的南勢阿美人口雖在減少，但戶口數仍在增加。此現象代表著就整體而言，花蓮一帶的南勢阿美族裔的人口似乎有部份隱而不見。因為戶口的增加若非是整個家庭結構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是應該代表著人口數的成長。人口數減少而戶口數增加，可能部份是肇因於疾病的流行或戰爭。但是在這六年間並無此方面的紀錄，因此較合理的解釋方式可能是族裔身份的轉換。此點可能與部份南勢阿美人口被登錄為非南勢阿美人口，特別是華人有關。尤其是與十九世紀末葉日漸移入男性華人口通婚，而在人口登錄上喪失南勢阿美身份的女性人口有關。

⁽¹¹³⁾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51。

⁽¹¹⁴⁾ 同上註，頁 147；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502。

⁽¹¹⁵⁾ 飽干與厝厝兩村的總人口數，仍遠於低加禮宛事件前的 Sakiraya 總人口數。因此，相對於男性而言，只要有不少的 Sakiraya 女性人口移到此兩村，即可顯著地影響兩村的性別人口比值。

四、聚落關係變化之分析

(一) 民族誌記錄下的南勢阿美村落以及十九世紀聚落間的關係

依據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的田野採集與研究，以及李亦園於戰後對前者所作的整理，我們可約略地了解傳統上花蓮一帶南勢阿美各聚落彼此間的關係。⁽¹¹⁶⁾ 荳蘭與薄薄兩村據言其關係較密切，除了地理位置上的鄰近以及彼此間通婚行為的存在外，有關兩村在來源上的神話傳說也表現出較緊密的關係。但是與荳蘭、薄薄兩村不遠的里漏，則與前兩者的關係曖昧。譬如說，在有關於住民的來源傳說上，三個聚落都曾有共祖的傳說，或許是為南勢阿美共有的祖源說法。但口傳敘述中里漏又有來自南方的 Patsidar（即壽社）住民的混入。在祭祀活動中里漏村村民有一每隔八年舉行一次的舟祭儀式，以紀念其傳聞中乘舟而來的祖先此一段歷史，這是荳蘭與薄薄兩村所沒有的活動。最重要的是在荳蘭曾有一關於里漏的傳說，言及早期對荳蘭與薄薄而言因製鹽與打海漁是一禁忌（paihsin），故兩村是以粟與專司此兩項工作的里漏村村民交換。但在交易時只准荳蘭與薄薄兩村之村民攜粟至里漏處交易，後者不被允許前去前面兩者之村落交易。交易歸來之兩村村民尚得在回來時作一種驅靈儀式，以免把里漏的鬼靈帶回。又云荳蘭與薄薄兩村之村民禁止與里漏村村民通婚。很明顯地，在荳蘭、薄薄此兩村的認知體系中，里漏帶有明顯的異族味道。至於七腳川，在荳蘭與薄薄的傳說中曾提及七腳川之住民曾與其共祖，但較早即已獨立而自成一體系。但七腳川與荳蘭、薄薄和里漏間之關係卻是爭戰連連。可能係因彼此間極早即已脫離同祖源之認知對其彼此間相互爭戰的約束力。竹窩社或巾老耶，依其自身的口傳敘述，亦稱早期曾與荳蘭、薄薄、里漏與七腳川之先祖共居過，後才分開。在荳蘭方面也有相類似關於竹窩社的傳說。不過據言竹窩社的語言與前述的南勢阿美諸村差異極大，且有不少與噶瑪蘭一地的語言相同的語彙。⁽¹¹⁷⁾ 竹窩社與其它族群的關係定位甚複雜，將留於後面在十七世紀時的族群脈絡中去分析與揣測。竹窩社於 1878 年時因加禮宛事件而被清軍攻擊，戰後其村名被改為歸化社，另一部份住民則散至薄

⁽¹¹⁶⁾ 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

⁽¹¹⁷⁾ 噶瑪蘭一地的語言是用來泛指原居於今日之蘭陽平原的原住民語，可再細分為噶瑪蘭語、猴猴語以及哆囉美遠語。參閱詹素娟，〈宜蘭平原噶瑪蘭族之來源、分佈與遷徙——以哆囉美遠社、猴猴社為中心之研究〉，收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41-76。

薄社東加入飽干。厝厝的建立也較晚，依文獻中村名之有無而預估其成立約在十九世紀左右。依薄薄居民的口傳，厝厝的住民主要來自南方海岸阿美的 Tsiporan 此一氏族，初來時因其能製造陶器而暫居在里漏，待其人口漸多後即形成厝厝。據言因為當時僅有厝厝的住民在製造陶器，大部份他人皆視此為禁忌，故後者多用穀物與之交換。⁽¹¹⁸⁾

換句話說，依據二十世紀初南勢阿美不同村落住民的口述去建構起來的村落關係史，暫且不論當時口述者以其對當時代的社會脈絡的認知來對過往傳說的投射（reflection）或挪移（appropriation）會對所謂的歷史擬真有何種程度的扭曲，南勢阿美的村落關係似乎可用下列表五來概說。

表五 二十世紀初南勢阿美的村落關係

| | 荳 蘭 | 薄 薄 | 里 漏 | 七 腳 川 | 巾 老 耶 | 飽 干 |
|-------|------|------|------|-------|-------|---------|
| 厝 厝 | B | B | A | (C) | (A) | (A) / B |
| 飽 干 | (B) | (B) | A | (C) | (A) | --- |
| 巾 老 耶 | (不詳) | (不詳) | (不詳) | C | --- | --- |
| 七 腳 川 | C | C | C | --- | --- | --- |
| 里 漏 | B | B | --- | --- | --- | --- |
| 薄 薄 | A | --- | --- | --- | --- | --- |

資料來源：二十世紀初田調口述資料

說 明：① (B) 表示推測之狀況為 B；(A) / B 表示 (A) 或 B。

② A：表示兩村落間之常態關係為結盟、通婚或甚至混居之現象。

③ B：表示兩村落間之常態關係為結盟，但通婚情況無、不佳、或不詳且無混居狀態。

④ C：表示兩村落間之常態關係為戰爭狀態。

(二) 影響、規範聚落間關係的可能因素

在南勢阿美村落間的相互關係中，李亦園曾將其約略分為兩類：一是屬於阿

⁽¹¹⁸⁾ 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91-506；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43-149。

美本族中各村落間之關係，如荳蘭與七腳川；另一是阿美本族與外族間之關係，如南勢阿美的村落與太魯閣人之村落。前者間若存著敵對狀態，此敵對狀態並非是永久的，兩村落一旦媾和修好，即可發生諸如通婚、相互饋贈等屬和平狀態的行為；後者間則不曾存在著或戰或和之關係，其仇視態度永不稍減。⁽¹¹⁹⁾ 李亦園的二分法顯然略為草率，因為在實際上曾有例證顯示阿美本族與外族間的暫時和平狀態。例如廖守臣與林建宏的口訪紀錄中有來自今日豐濱的海岸阿美部族與賽德克人曾有過在今日之水璉一帶互劃獵區、和平相處過一段期間。⁽¹²⁰⁾ 更具體之資料則來自移至十六股一地的華人與附近南勢阿美的互動。據聞在平時雙方有婚姻關係存在，特別是南勢阿美的婦女嫁至男性人口過剩的華人拓殖區。但是當彼此村落間將起戰爭時，南勢阿美族人會事先將其嫁至華人處的婦女召回，此一行為也曾為華人殖民者對一戰爭將至的預警徵兆。⁽¹²¹⁾

這一些例證，似乎暗示著這一以語族單位為劃分標準，用二分法來建構出的村落間關係有不夠周詳之處。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以荳蘭、薄薄和里漏為例，此三個村落與同屬南勢阿美的七腳川，在發生戰爭時皆會彼此正式宣戰。宣戰儀式會有雙方的頭目參加，議定地點、時間，然後開始接觸。但是與不同語族，如屬來自木瓜溪屬賽德克人的木瓜番，則用突擊方式，特別是在十二月至次年二月間播粟期與出芽期，此時是木瓜番出沒較頻繁之際。戰後，與阿美本族之戰爭則有媾和儀式，戰敗者會宰豬備酒供參加儀式者食用。會中雙方作誓議訂盟好辦法。若是與外族之戰爭，則無戰後媾和之舉。⁽¹²²⁾ 也就是說，南勢阿美表現於戰爭行為的差異上，是屬同語族者是亦戰亦和的狀態。戰爭的時間、地點或甚至規模，都是可控制、可預知的。雖然彼此雙方可能是存在一長時期的敵對狀態中，例如荳蘭、薄薄、里漏相對於七腳川；⁽¹²³⁾ 但對不同語族，可能是語言無法儘然溝通之因，⁽¹²⁴⁾ 或是對方刻意去提升衝突層次的緣故，⁽¹²⁵⁾ 而導致彼此間都處於一交

⁽¹¹⁹⁾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70。

⁽¹²⁰⁾ 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83-84。

⁽¹²¹⁾ 本段敘述取自原十六股一住民，詹燕青，紀錄於 1996 年 10 月。

⁽¹²²⁾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72、175。

⁽¹²³⁾ 同上註，頁 146。

⁽¹²⁴⁾ 譬如說，賽德克人與入墾的華人相較下，前者與南勢阿美間的關係，依口傳顯然是比後者和南勢阿美間的關係來得較緊張。此差異可能是肇因於入墾十六股之華人，除了因通婚或貿易而與互相往來之南勢阿美較能維持一較穩定的關係外，也因通婚或貿易兩種行為，而與周遭之南勢阿美在語言互動層次上，強過於賽德克人與後者間之互動層次。

戰狀態（如無法預知的突襲），但是發生戰爭的時間週期在密集度方面仍有其規律性（例如在播粟期與出芽期之際）。但亦戰亦和之行為是可發生於不同語族身上的（例如與入墾之華人）。現將此層關係表示於表六。

表六 南勢阿美村落間關係之模式圖

| | | | |
|-------------------------|-------------------|------------------|--|
| 和平-----戰爭與媾和-----戰爭爲一常態 | | | |
| 皆存在 | | | |
| 同語族間 (如荳蘭與里漏) | 同語族間 (如荳蘭與七腳川) | | |
| | 異語族間 (如與華人之間) | 異語族間 (如與木瓜番間) | |

若再進一步分析、區分村落彼此間發生戰爭之原因，按李亦園的分法則約略可歸納爲四項：第一，爲同村或友村被擊殺的村民復仇；第二，爲土地或獵場的保衛或掠奪；第三，伴隨著農業週期而進行的一近乎宗教性質之戰爭；第四，炫耀個人勇武之精神。⁽¹²⁶⁾ 此四項分類裡的第一項，若追究其最原始的肇因時，是跟隨著後三項而來的。意即在此若暫不把報復視爲一動機的話，實際上，我們將誘發戰爭之因素減爲三項。如此一來，將可察覺第二項是較近乎爭取經濟資源的誘因，第三、四則較偏向宗教性質與文化價值觀的表現。再將此一戰爭肇因與表六結合來看，將發覺，一般而言，若村落間戰爭行為演變爲一常態現象時，比起戰爭與媾和行為輪替存在的狀態，其戰爭之肇因中屬經濟資源爭奪的層面，似乎略大於一較偏向宗教與文化爲主因。也就是說，對經濟資源爭奪的程度愈強，

⁽¹²⁵⁾ 如沿木瓜溪南下的賽德克人，因近百年來迫於人口壓力與彼此不同亞族間爲生存資源與空間的爭鬥，而急需去尋求一新生活空間。

⁽¹²⁶⁾ 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171-172。

其彼此間衝突的程度將愈高。像南勢阿美與日漸循木瓜溪而下賽德克人即為一例；另一方面，若對經濟資源爭奪的情形較不嚴重，如長期以來即已定居此的荳蘭、薄薄、里漏和七腳川間彼此對自身的領域空間界限的認知已較穩定，相對而言，彼此間戰爭的因素則顯得是屬於前述的第三、四項者較突出。換句話說，假設村落間彼此衝突的程度、持久性（intensity of intervillage warfare）越強，造成衝突的因素中屬經濟資源面向（economic rationale）方面所佔的重要性將愈高。

若配合表三的村落人口數以及前面各章節所敘及的個別村落間的關係（參照表五），南勢阿美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中末葉時可區分為三大社群，分別是巾老耶（即竹窩社）、七腳川和荳蘭、薄薄、里漏三村為中心集團。村落人口數較少者，像飽干與扈扈，則是依附於此三大集團，在維持其村落間之互動。⁽¹²⁷⁾

（三）十七世紀荷蘭文獻記錄下的南勢阿美村落及聚落間的關係

溯至十七世紀時，因為荷蘭文獻的紀錄是以村落為一單位，進而描述一獨立村落與其它村落間的互動狀況。因此從荷蘭文獻的紀錄來看，村落間的互動情形可簡單分為兩種方式，一是屬於敵對的戰爭狀況，另一則是屬於兩者有從屬或彼此結盟的狀態。

依照現已印行出刊的文獻來看，有關南勢阿美之描述屬 Talleroma，即荳蘭、

⁽¹²⁷⁾ 飽干與扈扈之所以能突出於上述三大社群而享有自己一獨立的村落身份（village identity），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此兩村與其所從屬的大村（如荳蘭與薄薄）間，並無可被認知或接納的血緣關係。換句話說，飽干與扈扈對荳蘭與薄薄而言是異族。因為在上述的大社群中，如竹窩社或七腳川，其本身都分別享有一統稱其社群的名稱，即反映在文獻裡的村落名稱。但其本身仍可再細分為有親屬、血緣關係的小社群。以竹窩社為例，即可再區分為 Takofan、Sinsay、Todo 與 Lifoh 四個各佔不同地理位置的小社群，只是統稱為竹窩社。參閱廖守臣，《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40。薄薄亦可再區分為 Rarivoh、Taratsan、Paralits 與 Tsipaokan 四個小區域。參閱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頁 493。像薄薄其總人口數在十九世紀末即已超過一千人，平均每個小社群也有二百五十人以上，多於扈扈單一村的人口數。但是在文獻記載中薄薄並未被細分，則或多或少肇因於其內部村民整體在內聚整合上的共識以及外界對其整體性的認可。此種共識是建立於血緣、團體活動（如宗教、祭祀、漁獵）等認知或行為上的集體身份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換句話說，在面對外界的記述或認知時，因所產生的身份認同的階序性現象（譬如說認同 Lifoh、竹窩社或南勢阿美此一三階序的身份）必須或多或少反應出當事者對其週遭社群的認知與詮釋。所以說在文獻記載中，我們可以閱讀到扈扈與飽干在十九世紀末被賦予一獨立的村落名。而像 Lifoh 則無法脫離其所屬的大社群而自成一被獨立記述的村落（即漢文中的「社」）。

薄薄與里漏的統稱，此一村落的紀錄最為豐富。⁽¹²⁸⁾ 早在 1643 年初一叫 Quesayman (即左衛門) 的日本住民即提供有關於 Talleroma 的情報給即將於同年五月前去今日之立霧溪口探金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主要是敘及 Talleroma 距 Tarraboan 約為一日之路程，以及兩地為一大河所隔，但位居於沿海低緩平原上的前者，實為一好的登陸點。⁽¹²⁹⁾ 當 Pieter Boon 的探金隊一行於同年四、五月時在立霧溪口的 Tarraboan 附近停留時，曾對 Tarraboan 的頭人表示和平與友誼，並要求在河之對岸(可能為今日之立霧溪)建蓋房子為住處。後項要求對方答應了，並在 Pieter Boon 要求下，Tarraboan 住民協助探金隊渡過河流。隔日，當 Pieter Boon 與 Tarraboan 的頭人們一同會談時，Pieter Boon 要求 Tarraboan 的頭人一人前去 Talleroma 處，以荷蘭人的名義向後者表示和平與友誼。⁽¹³⁰⁾ 稍後其中一頭人動身前去 Talleroma。再隔大約一至二日，Tarraboan 之頭人們前來見 Pieter Boon，表示願意接受荷蘭人所表示和平與友誼。至於 Talleroma 的住民，據言起初曾有些疑慮，後來則應允將於當晚或翌日現身。隔日的檔案記錄中，果見 Talleroma 的住民前來荷人駐地接受東印度公司所表示的和平。⁽¹³¹⁾

然而 Talleroma 住民與荷方探金隊之關係並非如此就維持在一和平與穩定的狀態。翌日，一住在立霧溪口一帶的西班牙女人前來 Pieter Boon 處警告探金隊一行。依據她從 Tarraboan 的頭人處得知，Talleroma 之住民打算趁探金隊一行部份成員前去探金時，在途中趁後者無防衛時擊殺，得手後再回過頭來擊殺探金隊其餘的人員。為此，Pieter Boon 在派遣探礦員 (mineur) Thomas Pluymmaecker、中士 (corporael) Andries Heyn、翻譯員與數名毛瑟槍兵 (musquettiers) 隨同 Tarraboan 住民去探金礦源地時，並未對外公佈探金礦此事，以防不測。⁽¹³²⁾ 此預謀之擊殺事件，雖然無法得知是否真有其事，也因 Pieter Boon 事先防範得當而沒有發生。

⁽¹²⁸⁾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55, 134, 138, 140, 141, 460, 465-466.

⁽¹²⁹⁾ *Ibid.*, p. 55.

⁽¹³⁰⁾ 原文為 *Onderentusschen heeft den E. capiteyn Boon verscheyde t'samenspreekingne met de oversten gehouden ende deselve oock onder anderen versocht dat een van haar in de dorpen tot Tellaroema teo wilde gaen,.....* 中村孝志譯為「Boon 雖然繼續和首長們會談，但他們 (Tarraboan 之頭人們) 要求荷蘭人到 Tellaroma 締結和平」似有不妥之處。見中村孝志，〈荷蘭人的臺灣採金事業再論〉，頁 95。本段翻譯承蒙翁佳音先生的指正。

⁽¹³¹⁾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137-139.

⁽¹³²⁾ *Ibid.*, pp. 139-140.

不過隔日當探金隊一行離開立霧溪口一帶往南行時，本來打算在 Talleroma 處過夜，但是不被當地住民所同意，且態度很壞地向荷蘭人索酒，探金隊一行因而不不得不移至 Tonauw 河畔過夜。Talleroma 之住民本來答應前來河畔協助探金隊築屋過夜，但一直未現身。且據言也未依照約定在 Zacharija（即 Sakiraya）之後供給荷方豬隻。⁽¹³³⁾

到了 1645 年 11 月，當荷蘭東印度公司決定再次派員前去 Tarraboan 探金時，此時 Talleroma 與 Vadan（今日之馬太鞍）等村落已被列為因素行不良而需出兵征伐以示懲罰之目標。⁽¹³⁴⁾ 待 Cornelis Caesar 與 Nicasius de Hooge 率的遠征軍繞 Pimaba 北上抵 Tarraboan 完成其探金任務後，在回程時攻擊了 Vadan 與 Saccareya（即 Sakiraya）兩村落，Talleroma 之住民則因其請求寬恕且答應與東印度公司和平相處而躲過被攻擊之厄運。⁽¹³⁵⁾

從上述已印行的荷蘭文獻檔案中，可間接地推測出 Talleroma 在十七世紀時南勢阿美中的地位。在語意上 Talleroma 有「本家之屬」（na-ruma-an）的意涵，似乎暗示著 Talleroma 在此區域內的地位。⁽¹³⁶⁾ 當 Pieter Boon 探金隊一行於今日的立霧溪口沿岸一帶活動時，只見前者要求 Tarraboan 的住民代為向 Talleroma 以荷方的名表示「和平與友誼」（de veede ende ones vruntschap）。而未聞荷方要向離 Tarraboan 較近，在地理位置分佈上約在 Tarraboan 與 Talleroma 間的 Sakiraya，主動要求 Tarraboan 代為表示「和平與友誼」，或親自前往示好。

在文獻中荷方所言及的「和平與友誼」，在語意上來說不一定是我們所認知的一介於相互平等階上的和平與友誼的關係。會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除了肇因於十七世紀時在異文化接觸此一脈絡中可能會產生的現象之外，有極大的偏差是因為「和平與友誼」此概念是在荷方、翻譯者（tolcken）與當地住民間傳遞。彼此都是用自身文化價值觀在揣測、掌握與了解此「和平與友誼」。在文獻上記錄者是荷方，所表現出的敘述也大多是以其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和意圖在詮釋。所以我們在探究此一「和平與友誼」的概念在當時的情境中所表現出來的含意時，必須小心不落入一全為荷蘭人的價值觀中。因此，為了解此「和平與友誼」概念在不同情境下的意涵，首先要了解南勢阿美村落間之關係。

⁽¹³³⁾ Ibid., pp. 140-141.

⁽¹³⁴⁾ Ibid., p. 460; 中村孝志，〈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頁 99。

⁽¹³⁵⁾ 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465-466.

⁽¹³⁶⁾ 中村孝志，〈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頁 97。

觀察南勢阿美中荳蘭、薄薄、里漏與厝厝諸村落間之關係（參照表五），彼此間存在著很明顯的並非是全然平等的位階關係。譬如荳蘭與薄薄對里漏，可能因為後者混有外圍者或異族的因素，而採取一較屬低位階的待遇。對於更晚遷入的厝厝，荳蘭與薄薄對其態度則更明顯，如僅准許厝厝的住民暫居於里漏。此種差別待遇，除了是對非本村系的外來者一屬血緣上的區別外，也有可能是對土地或獵場使用權的展現。換句話說，此即一地方的原居者對弱勢的後來者在使用前者所認知為其所屬的土地或獵場時的一種彼此間關係的展示，而此一關係是藉由位階的從屬來暗示。

由此來看 Tarraboan 與 Talleroma 的關係，Tarraboan 住民通行一當時使用於北臺灣沿海至立霧溪口一帶的一貿易通用語（lingua franca）Bassy 語；⁽¹³⁷⁾ 其與來自居住在 Cabelangh（噶瑪蘭）的住民，可能為也能操 Bassy 語的 Torobiawan，關係亦匪淺。⁽¹³⁸⁾ 換句話說，對 Talleroma 而言，Tarraboan 的外圍者或異族地位是可確定的。至於 Talleroma 與其他村落在十七世紀時之關係在文獻中則語焉未詳，不過仍可由上述所記載的現象來做一大膽的推測。譬如說以 Sakiraya 與 Talleroma 為例，從 Tarraboan、Sakiraya 和 Talleroma 的地理位置來看，Sakiraya 是介於其餘兩者之間的。但是，Pieter Boon 探金隊一行於今日的立霧溪口沿岸一帶活動時，只要求 Tarraboan 的住民代為向 Talleroma 以荷方的名表示「和平與友誼」的協議或照會。對於地理位置恰在兩村之間的 Sakiraya 反而未有如上的要求或表示。這似乎暗示著在彼時 Talleroma 在此地區的影響力是大於 Sakiraya 的。因此，Pieter Boon 探金隊一行在與 Tarraboan 的頭人們接觸一段時間之後，很快地就察覺到必須與 Talleroma 建立關係的必要性，此迫切性遠大於與鄰 Tarraboan 較近的 Sakiraya 建立關係來得急切。若我們再一併思考 Talleroma 此稱謂在意涵上含有「本家」之意，以及在荷蘭文獻中所提及的 Talleroma 住民敢於在與 Pieter Boon 探金隊一行建立了「和平與友誼」的關係後，仍然出爾反爾地預謀擊殺荷蘭人、對探金隊一行人索酒，並拒絕提供原先約定的牲口。相對地，Sakiraya 住民則對荷方的要求未聞有抗拒之意。由此，我們似乎不妨可大膽地推測在十七世紀上半葉時 Talleroma 在今日花蓮一帶的地位。換句話說，在當時 Talleroma 雖然不見對得對

⁽¹³⁷⁾ 中村孝志，〈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頁 103。

⁽¹³⁸⁾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頁 20-23；Blussé et al.,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pp. 140-141.

Sakiraya 有直接的支配權，但是前者在今日花蓮一帶的霸權地位似乎比後者來得高。前者在彼時的花蓮一帶的支配性地位，反映在其對一新的外圍者或異族——Pieter Boon 的探金隊一行的態度上。

在十九世紀中末葉漢籍文獻內出現頻繁的南勢阿美三大社群：巾老耶（即竹窩社），七腳川和荳蘭、薄薄、里漏為中心的集團，在十七世紀時，所對應的名稱，依次分別為 Sakiraya、Sicosuan 與 Talleroma。Sakiraya 與 Talleroma 曾出現在荷蘭文獻內的《臺灣日誌》中，日誌中並無 Sicosuan，但是在中村孝志的荷蘭時代村落戶口表中則有 Sicosuan。⁽¹³⁹⁾ 可惜有關南勢阿美部份並無人口資料，僅有村落名稱。⁽¹⁴⁰⁾ 若按照十九世紀中葉七腳川活躍的程度、人口數之多以及三大社群在地理空間分佈上的近鄰，實在難想像 Sicosuan 會在十七世紀時被在今日花蓮一帶為探金而出沒頻繁的荷蘭人在文獻上所遺漏，特別是在表一中七腳川此一聚落在不同時期的紀錄中都一直存在著，並沒有間斷。在 1694 年印行的《臺灣府志》中，甚至有用直腳宣五社此一名稱來概稱今日花蓮一帶南勢阿美的村落，可見在十七世紀末葉時七腳川即已是一重要之聚落。為何獨漏於荷蘭時代的《臺灣日誌》內，不管是對花蓮一帶描述是詳盡的探金隊日誌、或是《臺灣日誌》內對東臺灣重要大聚落的報告中都無 Sicosuan 的記載，實屬一謎。目前可較被接受的解釋方式是 Sicosuan 在荷蘭時代之人口數可能較少，且未與東印度公司做正面衝突，加上又因其地理位置較偏內陸山腳一帶，較易遠離來自海上的荷蘭人注意，因而在《臺灣日誌》中缺席。不過詳細情形仍有待新史料的刊行方能知曉。

（四）十七到十九世紀的南勢阿美聚落間關係

綜合上面所述，南勢阿美的村落間關係在十七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末葉似乎有了一屬於權力結構的變化。如果從有限的荷蘭文獻資料中所推估的部落間關係能成立的話，在十七世紀前半葉，南勢阿美是以 Talleroma 為中心的一權力結構，雖然這權力結構並不是代表著 Talleroma 對其它南勢阿美有著宰制權。也就是說，此權力結構的中心假設是相對於十九世紀末葉所見到的圖像互相比對而得來的概念。在十九世紀末葉，我們從民俗誌的口訪資料中得到的權力結構圖像，則較傾向於荳蘭、薄薄、里漏（即 Talleroma）、七腳川（Sicosuan）與竹窩社（Sakiraya）三雄頂立的局面。換句話說，南勢阿美從十七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末葉此段期間

⁽¹³⁹⁾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0。

⁽¹⁴⁰⁾ 戶口表中屬於《卑南以北未歸順》此一欄。

在村落權力結構的變遷方面，似乎是逐漸依循著一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方向在進行，最後造就了我們所看到的，也就是在清帝國的國家權力以及華人大量前來墾殖這兩因素對南勢阿美造成衝擊前，三個主要的權力集團（power blocks）。此點推論恰可與南勢阿美各村落住民所口傳的歷史來源相配合。⁽¹⁴¹⁾ 意即大部份原本多與荳蘭、薄薄等原屬 Talleroma 本家體系者在早期有著某種程度上的淵源，但隨著時間而彼此間日漸疏離，演變成十九世紀中葉所見的圖像。

等到 1874 年（同治十三年），清帝國對東臺灣之政策改採所謂的「開山撫番」後，隔年，東臺灣正式成立一行政區——卑南廳。東臺灣正式成爲一被移民的對象。同年，卑南首設一招撫局，下置秀姑巒與花蓮港兩分局。⁽¹⁴²⁾ 所謂「開山撫番」政策，對南勢阿美生活領域的影響意義最深遠的，是整個國家體制的介入。不同於早期零星前來墾殖的華人，國家體制的入侵所代表的是軍事力量的強制性干預，以及帶有絕對權威性的國家制度，對當地住民的生活宰制。其所帶來的衝擊，遠大於自發性的零星華人入墾事件的影響。

「開山撫番」政策在實行上首重軍事據點的建立。企圖透過對帝國邊防的鞏固，來確保疆域的完整。沈葆楨在其「會籌全臺大局」此一疏，以及羅大春在其《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中，即道盡了此一行事之動機。⁽¹⁴³⁾ 因此，從清帝國的官方文獻記載中，北起蘇澳五里亭，南至吳全城一帶，此一屬羅大春所屬的北路軍駐區，即紮有十三營半，外加一營水師的部隊。⁽¹⁴⁴⁾ 這些駐防的清軍，象徵著南勢阿美的生活領域已淪爲被外力所控制的局面。前面章節所敘及的 1878 年（光

⁽¹⁴¹⁾ 南勢阿美共祖或祖先共居的傳說，主要也僅存在於以荳蘭、薄薄、里漏、七腳川、竹窩社這些構成十九世紀中末葉三大集團為主的村落中。相較之下，外來系統色彩較強的村落，像魁魁與尚未混入竹窩社住民的飽干，則缺乏此方面的口傳紀錄。參閱馬淵東一、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91-506；李亦園，〈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頁 43-49。

⁽¹⁴²⁾ 駱香林編，《花蓮縣志》，卷十土地，頁 5；《花蓮縣志》，卷五，糧政、農業，頁 18。

⁽¹⁴³⁾ 諸家，《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文叢第 288 種，1971），頁 74；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62；張家著，《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33。沈葆楨的原文約略為「……近者芟夷修闢，雖日起有功；若欲盡番壤而郡邑之，取番眾而衣冠之，必非一朝一夕所能致。倭事雖已順平，而各路之師至今不可撤。……此時經營後山是為防患計，而非為興利計；如為興利計，則儘可緩圖，如為防患，則必難中止。因為後山一失，前山亦不可復守」。參閱《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頁 74。羅大春則因應外船常航巡臺灣北部與東北部，深感旁人勢力挑戰清帝國於東臺灣的權威，而在回復夏復濤（即夏獻綸）時，言及「後山之兵勇此時可增而不可減；否則，有土地而無人民，則其地終非吾有」。參閱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62。

⁽¹⁴⁴⁾ 諸家，《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頁 87；張家著，《一個城市的誕生》，頁 33。

緒四年)因族群衝突所引發的加禮宛事件,即因清帝國軍事力量早已成定勢的空間佈局與機動調度,而能迅速地擊毀了事件中的要角——加禮宛住民與屬南勢阿美的竹窩宛住民的武力。⁽¹⁴⁵⁾換句話說,南勢阿美三個主要的權力集團於此時則是遭到入侵的國家體制所帶來的箝制。在村落權力結構的變遷方面,則是遭到外力的強行介入。相較於早期時所依循的一去中心化過程,在此時則是 Sakiraya 此一權力集團的被瓦解,僅餘 Talleroma 與 Sicosuan 雙雄並立的局勢。

五、結論

本文試圖藉由有限的文獻資料,對十七至十九世紀花蓮一帶之原住民,主要為屬近代人類學分類上的南勢阿美的歷史,做一番補白的工作。除了重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南勢阿美聚落外,並試圖藉由有限的文獻資料,對其十九世紀末的人口結構、以及十七至十九世紀間村落集團勢力的可能變遷,提出一符合歷史脈絡、史料、且較可被接受的詮釋。

從十七世以來,大體而言,南勢阿美的人口是呈現出逐漸增長的趨勢。在 1875 年滿清政權藉由所謂「開山撫番」政策,勢力正式逐漸進入東臺灣時,其人口約有七千七百餘人。隨後南勢阿美的人口即開始減少,在滿清政權即將結束其在臺灣的統治時,南勢阿美的人口已降至六千人不到。造成南勢阿美人口在十九世紀末葉減少之原因可能有二,一是 1878 年爆發的加禮宛事件,使得南勢阿美中的主要聚落之一巾老耶(即竹窩社或 Sakiraya)損失大批人口;二是入墾奇萊原野的華人是一以男性為主體的社群,常與鄰近的南勢阿美婦女通婚。在一以男性為主體的漢文化主導下,通婚的南勢阿美人口會面臨到在人口登錄上喪失其族裔身份此一現象。上述此兩論點皆可間接由 1894 年與 1900 的村落人口數資料中去推估。

南勢阿美與非南勢阿美的異語族間之關係存在著常態和平、亦戰亦和以及常態戰爭三種不同面向。同語族間之關係則較傾向於前兩者,異語族間之關係則較傾向於後兩者。

⁽¹⁴⁵⁾ 吳贊誠,《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頁 26-32;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68。

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這段期間，南勢阿美內部之村落間關係也似乎經過了一權力結構的變化。從荷蘭文獻內有限的資料以及十九世末以來的文獻中，似乎暗示著南勢阿美的村落權力關係是依循著一去中心化的過程在進行。也就是說，十七世紀時，語詞意涵中帶著「本家」之意的 Talleroma，此集團所享有的權力比起在十九世紀末葉時來得大。此點可由荷蘭文獻內其對外者的支配權上看出些端倪。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國家權力以及華人墾殖大量介入前時，南勢阿美則已逐漸形成荳蘭、薄薄、里漏（即 Talleroma 之統稱）、七腳川（Sicosuan）與竹窩社（Sakiraya）三個集團頂立的局面。隨後國家權力涉入，因 Sakiraya 在歷史過程中採取與國家體制對立的立場，而被國家強勢地瓦解，僅餘 Talleroma 與 Sicosuan 並立的局勢。

引用書目

不著撰者

1904 〈臺東移住民史〉，《臺灣慣習記事》4(1)：5-14；4(2)：105-116。

不著撰者

1963 《臺灣地輿全圖》，臺灣文獻叢刊第18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銀行研究室。

中村孝志

1949 〈臺灣〉，《天理大學報》1(1)：271-324。

1992a 〈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臺灣風物》42(3)：85-118。

1992b 〈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臺灣風物》42(4)：17-23。

1993 〈一六六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臺灣風物》43(1)：155-168。

1994 〈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1)：197-234。

中村孝志著、賴永祥譯

1956 〈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臺北文獻叢輯》2：21-36。

文崇一、俞祖庚、許毓秀、孫和智

1977 〈臺東縱谷土著族的群體與社區權力〉，《結構民族社會學報》15：57-82。

王天送

1992 〈花蓮縣史前文化遺址〉，《臺灣文獻》43(3)：261-274。

田代安定

1985 《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民課。臺北：成文。

余文儀

1995 《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七）。臺北：宗青。

吳親恩、張振岳

1995 《人文花蓮》。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

吳贊誠

1966 《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23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李亦園

1982 〈南勢阿美的部落組織〉，收於氏著，《臺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頁139-178。臺北：聯經。

沈葆楨

1959 《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2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鍾瑄、陳夢林

1995 《諸羅縣志》，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十）。臺北：宗青。

孟祥翰

1988 〈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朝榮
1957 《臺灣地形》。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林道生
1996 《阿美族的歷史風土傳奇》。臺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 施添福
1990 〈地理學中的空間觀點〉，《地理研究報告》16：115-137。
1991 〈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46-50。
1993 〈臺灣聚落研究及其史料分析——以日治時期的地形圖為例〉，收於張炎憲、陳美蓉合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灣史料評析講座紀錄》，頁131-184。臺北：自立。
1994 《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三）》。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6 《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理論資料與基本資料（上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 胡傳
1993 《臺東州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8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 《臺灣日記與稟啓（一）》，臺灣文獻叢刊第7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夏獻綸
1959 《臺灣輿圖》，臺灣文獻叢刊第4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高拱乾
1995 《臺灣府志》，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二）。臺北：宗青。
- 張永楨
1986 《清代臺灣後山開發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家菁
1966 《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 張德水
1996 《臺灣種族、地名、政治沿革》。臺北：前衛。
- 盛清沂
1979 〈清代同光之際開山撫番史事編年〉，《臺灣文獻》30(3)：324-344。
-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 郭輝譯
1989 《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正祥
1960 《臺灣地誌》。臺北：數明產業地理研究所。
- 陳培桂
1959 《淡水廳志（三）》，臺灣文獻叢刊第17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陳淑均
1993 《噶瑪蘭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程大學譯
1989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黃士強

- 1989 《東部海岸陸域資源調查及分析：人文史跡資料調查分析》。臺灣省住都局市鄉規劃處委託，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執行。

楊貴三等

- 1991 〈花蓮縣隆起海岸平原的地形學研究〉，《花師社教系刊》2：44-57。

溫吉

- 1957 《臺灣番政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詹素娟

- 1995a 〈宜蘭平原噶瑪蘭族之來源、分佈與遷徙——以哆囉美遠社、猴猴社為中心之研究〉，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41-76。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1995b 〈族群歷史研究的「常」與「變」——以平埔研究為中心〉，《新史學》6(4)：127-162。
- 1996 〈Sanasai 傳說圖的平埔族群歷史圖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6月28日-6月29日。
- 1997 〈歷史轉折期的噶瑪蘭族——十九世紀的擴期與變遷〉，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5月16-17日。

廖守臣

- 1977 〈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4：61-206。
- 1978 〈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5：81-211。
- 1985 《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未印稿。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72 《臺灣省通志》，卷八，同胄志，固有文化篇。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本署編

- 1914 《番地地形圖，花蓮港》。

劉益昌

- 1988 〈花蓮縣秀林鄉普洛灣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中研院史語所集刊》。61(2)。
- 1990 〈臺灣地區史前文化概說——兼述大關地區史前文化〉，《花師社教系刊》1：10-17。
- 1995 〈臺灣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之探討〉，收於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頁1-2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1996 〈再談臺灣北、東部地區的族群分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6月28-29日。
- 1997 〈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史前時代晚期的文化〉，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臺灣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5月16-17日。

劉銘傳

- 1958 《劉壯肅公奏議》，臺灣文獻叢刊第2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潘繼道

- 1992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蔣毓英

- 1995 《臺灣府志》。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一)。臺北：宗青。

諸家

- 1971 《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28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駱香林

- 1953a 〈花蓮文獻創刊號敘〉，《花蓮文獻》1：2。
 1953b 〈花蓮清時治績考〉，《花蓮文獻》1：3-9。
 1955 〈花蓮文獻事蹟〉，《花蓮文獻》4：1-12。

駱香林編

- 1978 《花蓮縣志》，卷十，土地。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1979a 《花蓮縣志》，卷五，糧政、農業。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1979b 《花蓮縣志》，卷五，民族、宗教。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 1904 《花蓮港》，二萬分之一堡圖。

藍鼎元

- 1958 《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鄭其照

- 1995 〈臺灣番社考〉，收於諸家，《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方志集成，清代篇，第一輯（三十三），頁35-39。臺北：宗青。

羅大春

- 1972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文獻叢刊第30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藤崎濟之助

- 1988 《臺灣的蕃族》。臺北：南天。

Blussé, Leonard,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 1984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Blussé, Leonard,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 199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M. Nijhoff.

- 199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M. Nijhoff.

Borao, José Eugenio

- 1992 "Spanish Presence in Taiwan, 1626-1642."《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7: 1-16.

- 1993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 98-120.

Mackay, George Leslie

- 1991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Schegel, Stuart A.

- 1979 *Tiruray Subsistence*.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Shepherd, John Robert

-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4, No. 1, pp. 5-48, Jun. 1997 (Apr. 1999)
Preparatory Offic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 Preliminary Inquiry on the 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of the Nan-shih Ami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eter K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the Nan-shih Ami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employing the documents left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or VO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ose in Chines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first objective is to reconstruct the settlements of the Nan-shih Ami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rofiles. Then, I explor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the Nan-shih Amis and further endeavor to offer an acceptable interpretation to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ociety of the Nan-Shih Amis based the demographic data available in the documents. Finally, I treat the settlement as the basic unit and further try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 blocks within the Nan-Shih Amis betwee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 Formosan Austronesians, Nan-shih Amis, History of Taiwan, Hualien

*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Hualien Normal College.